

附件 1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 砺红色初心 担奋进使命”
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文本**

目 录

一渡赤水入川来	4
赤水密电立奇功	7
营盘山上桔子红	10
粮缸中的字条	12
军民共度开心年	14
三块铜板熠熠生辉	16
洛亥人民心中的“纪律歌”	19
二郎滩开仓分盐	22
长坝槽击落敌机	25
塔子山下架浮桥	28
拌桶作船巧渡江	31
红军菜	34
红军桥	37
傣傣族同胞带红军过南山	40
红军军刀	43
险途上的战略抉择	45
一枚红军证章背后的生死营救	48
红军医术传藏家	51
飞夺泸定桥	54
胡长保舍身保卫毛主席	57

长征中的“隆中对”	60
两河口欢迎会	63
天宝当红军	66
地里的钱币	69
海拔 4450 米的信仰	72
毛泽东命战士归还腊羊架子	75
周恩来病重心系纪律	78
拐棍碑	80
最后一口粮	83
红军神兵战川军	86
最后的党费	89
横山岗战斗	92
红军班长赠宝刀	95
传家扁担	98
雪山忠魂	101
骑兵师筹粮	103
扎纳亚山口的最后嘱托	105
特殊的斗争	107
半截皮带	110
牧民抚养红军娃	112

一渡赤水入川来

在川黔交界深山翠绿间，有着一座并不起眼的石板桥——岩桑沟兴桥。桥上的石板经过岁月打磨，愈发光滑，仿佛在诉说着那个冬天，一支队伍从桥上走过，从这里走进了四川，走到了陕北，最终走上了天安门城楼……

1935年1月28日，青杠坡战斗打响，由于多种原因，中央红军主力受挫，未能达到“全歼尾追之敌，再全力北上”的战略目标，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以南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1月29日，中央红军从贵州土城、猿猴场一渡赤水河，兵分三路到达古蔺。右纵队统归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指挥，从猿猴场渡过赤水河，到达黄荆老林的店子坝。左纵队统归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指挥，从土城下游搭设浮桥渡过赤水河，到达太平渡。毛泽东随中路，由土城经陶场坝、小天堂、马蹄坳、汪家沟等地，到达了岩桑沟。毛泽东通过一座川黔交界处伫立着的小石桥，进入了四川。

岩桑沟兴桥由一个名叫江代世的人所修，一边连着贵州省习

水县醒民镇马蹄村，一边接着四川省古蔺县永乐街道德付村。桥面呈东西向，为单孔平桥，桥长约6米，宽约1.3米，高约5米。与其他桥梁不同的是，此桥为木石混合结构，即桥跨用3块长约6米的大方木搭建于两岸石桥墩而成，桥面铺筑两层石板，既简易又能防止木料腐坏。

在深冬的山风中，毛泽东踏上了岩桑沟兴桥。他的步伐明显放慢了，当他的布鞋完全踏上四川一侧的土地时，他忽然停下，转身望向来路，久久不语。

原来，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毛泽东曾接到中共中央指派赴四川工作，在重庆建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并担任省委书记。但他认为四川缺乏革命基础，坚持要求回到充分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区——湖南。于是，他说服中央改派他到湖南去进行革命。所以，踏上四川土地的这一步，整整迟来了8年。

毛泽东一行进入四川后，来到古蔺县凤龙堂渡口准备过河。岸边村民罗寅章的家门开着，他的妻子魏氏在家，毛泽东便让随行人员进去找主人讨口水喝。

“大娘，我们路过的，想讨碗水喝。”随行的红军小战士礼貌地说。魏氏打量着门外这群人，目光落在他们脚上沾满泥泞的草鞋上，连忙让开身子：“进来进来，这么冷的天喝什么冷水！快

进来烤烤火。”

屋子里很简陋，泥土地面，中央是个火塘，柴火烧得正旺。魏氏在柴火上架着罐儿炖茶，水沸腾后，魏氏取出平时都舍不得用的土茶叶放入罐儿中。起罐泡一会儿后，魏氏给屋里坐的毛主席一行每人倒了一杯茶。毛泽东喝着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罐儿茶，关切地询问一家生计、田地、收成等情况。语气温和，像自家人一样。

离开时，毛泽东坚持留下几个铜板。魏氏推辞不过，从灶台边包了一小包土茶叶塞到红军小战士手里：“路上喝，暖身子。”这一把茶叶、一杯热茶，藏着老百姓对红军最朴素的情谊。

傍晚时分，中央纵队在孙家坝宿营。毛泽东在油灯下摊开地图，铅笔在川滇黔交界处画了个圈。窗外，赤水河在夜色中潺潺流淌，仿佛在诉说这片土地上即将发生的传奇。

赤水密电立奇功

毛泽东说“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这个玻璃杯就是破译敌人密码工作。

1935年1月28日，中央红军在贵州土城青杠坡与川军展开激战，由于敌情没有摸准，很快红军和大肆来袭的川军形成对峙局面。在两军激战的关键时刻，军委二局的“破译三杰”：局长曾希圣、第一科即破译科科长曹祥仁和副科长邹毕兆寸步不离地守在电台旁，紧张地工作着。经过昼夜不息地工作，军委二局最终破译了川军极其复杂的密码，获悉敌人的包围圈只有一个不大的口子还没有合拢。党中央收到军委二局的报告后，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放弃歼敌、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

29日，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四川后，毛泽东鉴于长江沿岸已有敌军重兵防守，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令部队西进至扎西。在此期间，敌人不断变换通信密码，这无疑给破译工作增加了难度。同志们迎难而上，最终在扎西会议期间截获、破译了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龙云上报给蒋介石的《作战方略》，并且上报给了中革军委。我军有了这份情报，对敌人的行动部署了如指掌，

特别是当时敌人黔北兵力空虚的情报，让毛泽东欣喜若狂。他对军委二局的同志们说：“掌握的敌人情报很及时，工作做得不错。走夜路是要打个灯笼的，红军长征也得有个灯笼。那就是准确及时的敌人情报。”

毛泽东利用情报，在充分分析敌我形势基础上，认为此时敌军大部被吸引至川滇边地区，应选择敌军的薄弱环节黔北为进攻目标，遂挥师东进，返回川南。2月18日红军向东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这时军委二局及时提供了截获的准确情报，毛泽东等领导人当即决定对娄山关之敌予以打击。25日，发起娄山关战斗，将敌6个团击溃。26日，毛泽东又依据军委二局提供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的位置，判断这两个师两日内赶不到遵义城，于是乘由娄山关溃退遵义之敌喘息未定之际发起攻击，并于2月28日攻占遵义城。当日，吴奇伟率部赶到遵义附近会同黔军王家烈残部进行反攻。军委二局又及时将破译的敌情和吴奇伟指挥部位置报告中革军委。毛泽东等领导人研究后决定围歼吴奇伟部，遂命红一军团主力直插忠庄铺，首先打乱敌人指挥，然后各个击破，最终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3月19日，军委二局再破敌3本新密本，密电显示蒋介石知晓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后，计划在赤水、叙永、古蔺一带截击红军。3月20日，毛泽东据此敌情，毅然决定东返。21日，中央红军开始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当日24时，蒋介石给云南省政

府主席龙云拍发“劲密”密电，云南省政府 22 日凌晨 1 时收到，13 时即被军委二局破译送到毛泽东面前，22 时变成红军的《敌情通报》。敌军统帅密电被破译，同一天变成我军《敌情通报》，敌我双方都留下直接文字证据的两封密电，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十分罕见。

24 日，军委二局又破译敌报，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坐镇指挥，而贵阳仅有国民党 99 师的 4 个团。毛泽东立即指挥红军掉头南下，直逼贵阳。

4 月 2 日，蒋介石密电“显有东窜之势”又被破译。毛泽东于是再派部分兵力向贵阳东北瓮安方向佯动，故意让敌机发现。蒋介石愈发坚定了他的错判：红军要到湘西！紧急命令各路国民党军日夜兼程东进。9 日，红军在贵阳以东 20 公里处突然转向西南，从敌军防线 30 公里的空隙中穿过。3 万红军将士在国民党 150 个团、40 多万大军眼皮底下，经云南北上抗日。23 日，红军已经进入千里之外的云南，蒋介石才大梦初醒，后悔莫及！

营盘山上桔子红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在川黔交界土城、猿猴场一带一渡赤水，进入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2月1日，红一军团二师先头部队到达叙永三岔河，与叙永县民团精选队接火，将其击溃。红军乘胜追击，直逼叙永县城，经方竹坝、尖山子、打卦石、渣口岩而下，首先猛攻县城东郊营盘山。经过激战，红军攻占了营盘山一带的敌堡，为红军大部队过境开辟了前进道路。

红军大部队来到营盘山时，只见漫山遍野是一树树红黄熟透的桔子，枝头硕果累累，拳头大的红桔把枝头压弯，果香诱人，伸手可摘。

“多美的桔子，多好的桔林啊！一棵树至少也能摘200多斤。”红军战士们赞叹道。又累又饿、又饥又渴的红军战士们，望着这些红桔，心里在想：把红桔剥开，放在嘴里面吃起来，那该是多么的解渴和充饥啊？但实际上，队伍默默行进在桔林间的石板路上。只有脚步声和偶尔的咳嗽声。每个战士都能听见自己肚子咕咕的叫声，但没有人伸手。

这时，红军看见一位衣衫破烂的老大爷站在路边。先遣工作

团的干部走上前去，询问道：“这桔林是你的吗？能不能卖一些给我们？”可老人忠厚的脸上露出惊惶不安的神情，红军干部判断桔林不是老人的。经过了解，红军干部查明这片桔林是一个土豪的，当即决定予以没收，并在路边插上一块木板，上面写着“这桔林是土豪的，现没收。各部队路过这里时，应有组织地在指定地区内采摘”，落款为“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先遣工作团”。

老人脸上惊恐的神色消失，承认自己是帮土豪看林的长工。在老人的帮助下，红军干部把桔林划分成几片，分批让路过这里的部队采食，单独划出一片留给穷人，请老大爷通知大家赶快采摘。附近群众闻讯，纷纷赶到桔林，走进过去不敢逾越的禁区，高兴地摘下红桔请红军战士品尝。但战士们坚持付钱后才会吃。

几十年后，这段往事仍在川南传颂。1981年，叙永籍老红军傅钟将军题写“营盘山上桔子红”7个大字寄回家乡。后人也写诗赞曰：“军过营盘桔树中，时当饥渴万人同。森严纪律西风里，不摘霜桔一颗红。”墨迹淋漓间，仿佛还能看见当年那片桔林，看见那些饥肠辘辘却纪律如铁的年轻身影。

今天，营盘山的桔林依然年年硕果累累。那漫山遍野的红桔，在岁月里化作了一颗颗跳动的初心——关于纪律，关于信仰，关于一支军队为什么能走过万水千山，最终赢得天下民心。

粮缸中的字条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在川黔交界的土城、猿猴场一带一渡赤水，进入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当时，红军总部先遣工作团干部战士的任务，除了在红军经过的地方宣传组织群众、安置伤病员、组织群众武装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便是要保证部队的粮食供应。

到达叙永县境后，先遣工作团的干部战士便分散到沿途两侧的村镇去筹粮。先遣工作团团长罗通决定到一家扣着门的老乡家里看看，心想，如果有粮食，找不到老乡，就按市价给老乡留下钱，写封信，再把粮食带走。可当他一走进老乡的屋子，就看到盛粮食的坛子里放着一些钱，钱上面还有一张纸条。罗通拿起纸条一看，上面写着：“老伯，实在对不起。我们是工农红军，因为两天没有吃上饭，路过这里，你不在家，所以把你家的粮食吃了一些。现在按市价给你留下了钱，望你能原谅。”下面署名的是红军某军团某部队的番号。

罗通走进老乡的另一间屋，在一个小缸里，发现一些粮食，他心里一阵高兴。可是立刻又看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同

志们，这家老乡的粮食，已被我们吃了一些，剩下这些不要再动了，以防老乡回来后买不到粮食，没饭吃。”下面署名的也是留钱部队的番号。看了这两张纸条，罗通颗粒未动，默默离开了老乡家。

很多年后，罗通老将军回忆说：“从古蔺向威信前进的中央纵队，到达永宁府（叙永）时，已经两天没吃一顿饱饭了。我们心里都非常着急……可是我们所到的村镇，有的土豪已经被先头部队‘打’了；有的村镇的群众，因为不了解红军，又怕在这里打仗，跑得光光的，有土豪也无法调查。实在没法，我决定到一家扣着门的老乡家里看看……看了这两张纸条，对于我们部队处处关心群众利益的优良作风，我觉得十分自豪。”

两张朴素的字条，一缸未动的粮食。正是这样的细节，像一颗火种，在川南的崇山峻岭间，点亮了民心，也指明了一支军队为什么能走向胜利的答案。

军民共度开心年

1935年2月，中央红军行经叙永县石厢子，和当地百姓一起开仓分粮分物，共度新年。这也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度过过的唯一一个春节。

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胁迫，当地老百姓对红军存在很大的误解，红军抵达石厢子前，都纷纷关门上山躲避。

2月3日（大年三十）下午，红军先后进驻石厢子。5时许，红军先遣部队先期到达了石厢子。进街后，红军立即开展宣传，在街沿、巷口张贴署有中央红军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的安民告示，书写“打土豪、分田地！”“红军与劳苦大众是一家！”等标语，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并说明红军买卖公平，叫老百姓不要怕、不要乱跑，照常开门做生意，迅速安定了群众情绪。当晚8时许，军委纵队也陆续到达了石厢子。石厢子的街沿、过道、院坝、房檐下都住满了红军。中革军委总部驻万寿宫，周恩来、朱德住在万寿宫，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高坎子肖有恩家，通讯机构设在刘春和、刘会元和陈文中家；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设在袁继武、彭海家；苏维埃纸币兑换处设在五圣宫；中央红军地方工作部没收委员会设在王连山家。前卫部

队驻扎相距 5 公里的安哆槽、比基槽、吴家桥一带，后掩部队驻在 10 多公里外的阿里普一带。这时正值寒冬腊月，天上不时地飘着雪花，但红军始终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

留在场镇上的人，真正了解了红军的政策之后，劝回了上山躲避的群众。老百姓们相继回家，纷纷拿出精心积攒准备过年的腊肉刀头、糖豆、粑粑面、醪糟、红灰毛、米酒等，做成“丰盛”的年夜饭，请红军吃。红军难却苗、彝群众盛情，便与当地群众共进年夜饭，饭后均付给群众餐费。

2 月 4 日（农历正月初一），中央红军地方工作部没收委员会经过调查了解，派人没收土豪劣绅彭正楷、周世成两家的粮食和财物，并在街上召开群众大会，分给穷苦老百姓，声讨镇压欺压百姓的税卡员肖宝芝。又在吴家桥将团总吴联山家的肥猪杀了，生火造饭，炖坨子、红烧肉，请当地老乡同吃。街上煮酒的百姓，拿出所有存酒，军民共饮。一盆盆、一钵钵，热气腾腾；一杯杯、一盏盏，情深意浓。这里一圈、那里一圈，围坐而食。江西老表、湖南老乡即兴哼起家乡小曲，彝族群众唱起酒歌，军民共度开心年。

终年劳苦却得不到温饱的穷人，在红军的帮助下，终于在年关分得粮食、衣物、猪肉，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如今，当年军民一起哼唱的民谣“红军到、干人笑；要得干人笑、白军不到红军到”还在这里流传……

三块铜板熠熠生辉

叙永县石厢子彝族乡，南隔赤水河与贵州相望，西与云南飞地接壤。这里古木参天，怪石嶙峋，地势险要。

90 多年前，这里还是一个仅有 70 多户人家的小村庄，聚居着汉、彝、苗等各族群众 400 多人。1935 年 2 月 3 日，正值农历大年三十，石厢子的人家张灯结彩，准备迎接新年。下午，村民们发现，山口阳坡地上一面印着镰刀与锤子的红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一支穿着灰军装的队伍在茫茫雪地上整齐行进、蜿蜒而来。一开始，老百姓不了解这支红军队伍，都对其心存疑虑，有的还跑进周围的山里躲了起来。最先到达的红军有 10 多人，他们一进街就迅速在村里开展宣传、书写标语，并和蔼地对乡亲们说：“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劳苦人民群众的军队。”在战士们的持续动员下，老百姓渐渐认识了红军队伍，一些躲在山里的群众也回到了家里。

当天下午 5 时许，红军先遣部队基本上都到达了石厢子。寒冷的冬日里，红军将士有的光着脚丫，有的穿着草鞋，有的用破布包住脚板，但他们就在沿街的屋檐下、院坝中站着，没有一个

人去打扰老百姓，更没有去强占强要老百姓的东西。老百姓感受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军队大不一样，纷纷打开自家大门，迎接红军进屋休息，并烧旺炉火，供红军战士取暖。当晚，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暂住在这场镇的肖家大院。大院的主人肖有恩只知道红军的几个大官住在自己家里，却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经过3天2夜短暂休整后，红军拔营离开。2月5日上午，毛泽东执意给肖有恩留下3块铜板，当作借宿的“烟火钱”。当时肖有恩一再拒绝，但毛主席说吃了老百姓的饭、住了老百姓的屋，坚决要留下铜板。红军走后，肖有恩觉得这3块铜板来得珍贵，又怕被土匪抢夺，便把它们嵌进家中一根门柱的裂缝里藏起来，并在裂缝处抹了一些与房柱颜色相同的泥巴做掩盖。

新中国成立后，肖有恩的家人把毛主席画像挂在家里。有一天午饭后，肖有恩看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突然觉得毛主席的面相有点眼熟，好像以前在哪里见过似的。他皱着眉头努力地回想，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那个风雪夜，火塘边的湖南口音，那双深邃的眼睛，那3块带着体温的铜板……原来，那个执意要付“烟火钱”的高个子红军，就是毛主席！肖有恩老泪纵横。他让儿子把毛主席睡过的木床、用过的桌椅都搬到厢房珍藏起来，用红布盖好。寨子里的人都来看稀奇，老人一遍又一遍讲述那个除夕的故事，却始终没有说出3块铜板的下落。肖有恩去世后，3块铜

板的去向成谜。守老屋的侄子肖为勤在老屋找了几次，也没有发现。

2014年6月，当地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住过的房子作为革命遗址遗迹加以保护、修缮。在工人用锉子给一根房柱翻新时，突然“叮”的一声脆响。

“啥东西？”肖为勤凑过来。

工人用凿子小心撬开裂缝处的填料，3枚圆形铜板的边缘在阳光下闪出金色的微光。历经79年岁月，它们锃亮依然，仿佛还带着那个风雪清晨的温度。肖为勤忽然想起伯父临终前含糊的话：“柱子……柱子……”

如今，当人们再次走进石厢子街365号，总会在肖有恩家的门柱前驻足。镶嵌在屋柱上的3块铜板已经和柱壁融为一体，铜板光亮，熠熠生辉。人们仿佛还能看见——1935年那个除夕夜，火塘映照着一张张年轻坚毅的脸庞；清晨离别时，那双把铜板按进老人掌心的温暖大手，还有中国共产党人永不褪色的优良品质。

洛亥人民心中的“纪律歌”

1935年2月，因反动势力对红军的造谣抹黑，新年中的珙县洛亥镇上也少见人影，百姓大多躲进了山里，中央红军红二师所属一路部队、一路云南旧城（长官司）红军及先行靠近洛亥驻扎的一支红军连队，向着洛亥行进。

红军宣传队紧跟在先遣队后进入洛亥，眼见着洛亥街村十户九空，街上只有少数不听反动派谣言的老百姓留守在家。为了洗清反动派给红军泼的“脏水”，破除当地群众对红军的不良印象，红军在街头巷尾的墙上张贴布告，书写“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中国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等标语，落款是“苏维埃政府”。

一位指挥员带领一个红军班到达团防局碉门前，命令团丁把碉门打开，一个个查问情况。被抓起来的穷人和投降的团丁均获释放，还分得过年吃的黄粑、猪儿粑等粮食。团防大队长闵德云、保长张安和等人平日横霸乡里、鱼肉百姓，民愤极大，红军抵达洛亥前更是造谣惑众，污蔑丑化红军。根据群众要求，红军将其抓捕后镇压，替洛亥人民铲除了两害。

大部队进入洛亥，战士们解下背包席地而坐，秩序井然。部队领导向战士们介绍了敌情和当地情况，告诉战士们即使条件艰苦也要牢记部队纪律。会后，战士们齐声高唱《纪律歌》：

红军纪律要严明，

行动听指挥，

切莫胡乱行。

打土豪，

要归公，

买卖要公平。

对人要和气，

开口莫骂人，

借物要归还，

洗澡避女人。

军民之间，

相亲相爱，

胜似一家人。

夜幕降临后，红军在街上或附近的上榜、鹅塘、火石、新村一带驻扎帐篷，不扰民、不拿群众东西。在城外宿营的部队，能搭棚子的就搭棚子，碰到农家就睡在农家的坎上和坝子里，或是

在草坪上、在树下头枕包裹睡去；在街村宿营的战士们，没有一个进入商铺或进入里屋，而是借用主人家的禾草、门板打地铺睡在走廊下、街沿下，要么镇着胳膊、蜷着身子，要么倚着墙根、席地而卧。正月里寒风凛凛，地上冰凉，却没有战士违反纪律。

第二天拂晓，洛亥坝子里军号嘹亮，住在各处的红军集合起来，唱着《纪律歌》就出发了。川南冬日多雾，日出的太阳一照，战士们的衣服上、脸上、枪上，都凝了一层雾霜。百姓知晓红军离开后，返回各自家里仔细查看，发现所有家具什物一件不缺，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缸里的水装得满满的，圈里的猪儿也喂得饱饱的，鸡、鹅、鸭、兔一只也不少。一些人家还有红军留下的猪肉、谷米、黄粑、粉子面等。新年头上，被恶霸肆意搜刮家中余粮空空的穷苦百姓都很惊奇：这年头哪儿还有不拿百姓东西还给送食物的兵呢？那些留守在家以及被红军解救出来的乡亲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当地百姓纷纷说到：纪律歌没唱错，红军真是我们百姓的子弟兵！

二郎滩开仓分盐

“好个二郎滩，四面都是山，天天背盐巴，顿顿菜汤淡。”这是解放前古蔺县二郎滩穷人传唱的一首民谣。

当时，贵州军阀侯之担占据黔北及川南古蔺、叙水、古宋等县以后，把持赤水河上的盐务，在二郎滩设有可以囤积几十万斤盐巴的大型转运站“四益公”盐号，并派遣外号“郑豺狗”的郑松林率领盐防队驻防。小镇周边穷苦百姓则靠背盐维生，长期食不果腹，连喝汤吃菜也舍不得多放一点盐巴，从而形成了民谣中“天天背盐巴，顿顿菜汤淡”的凄异景象。

1935年2月中旬，红军自扎西回师的消息传到二郎滩，盐防队闻讯惊慌逃窜。2月18日，二郎滩的劳苦群众奔走相告“红军已经到了核桃坝了！”果然，当天下午，中央红军先遣团来到了二郎滩街上，随后大部队陆续开进。得知群众没有盐巴吃，红军当天晚上便在“四益公”盐号召开群众大会，街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挤满盐号大院，聆听团政治处王主任的讲话。王主任身穿青灰色军装，高高的个子，饱满的脸庞，他向大家招招手，让人们安静下来，然后用清晰的江西口音讲开了：“乡亲们，咱中

国工农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是打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队伍，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官资。二郎滩的‘四益公’盐号，就是贵州军阀侯之担开办的。他们为了赚钱，囤积居奇，抬高盐价，使这一带广大群众没法吃到盐巴。我们要打开盐仓，把盐巴分给群众。”

“都来分盐！大家除准备工具参加分盐以外，回去还要通知附近的穷人都来分盐！”红军连长曾胜站起来补充说道。群众们受到鼓舞后纷纷涌向盐仓，村民余四海第一个举起大铁锤，“当！当！当！”几下，将门上的铁锁砸个粉碎。曾连长和几位红军战士合力打开盐仓，把一块块雪白的盐巴分给大家。大伙拿到盐后笑逐颜开，欢欣鼓舞。“红军和我们穷人心连心，真是我们的贴心人。”

红军在二郎滩开仓分盐的喜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快传开。第二天一早，赤水河两岸的川黔农民，纷纷涌向二郎滩，人人都希望分到一块盐，小镇沸腾了。人们来到“四益公”盐号门口，互相探询着什么时候开始分盐。一位红军干部精神抖擞地出现在盐号门前，向人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接着，红军战士打开盐仓，把大块大块的盐巴分给群众。人越来越多，不一会儿，红军战士累得满头大汗，汗水浸透衣服。他们商量片刻后，大声向群众宣布：“老乡们，我们不分了，你们自个搬吧，回去以后通知没来过的人都快来背盐巴！”对一些上了年

纪的老人，红军则帮忙把盐送到他们家中。当时红军听说山上住着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便走了几里路将盐送过去。老人十分感激，此后便在家门口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放了一个装满茶的水壶，供运盐的干人解渴，逢人便讲红军送盐上门的事。

分盐期间，因红军到来退守山林的郑松林，不甘心盐就此被穷人分走，带着几十个盐防军，畏畏缩缩地向二郎滩摸来，在百姓背盐的必经之路大埡口附近拦截盐巴，恐吓甚至毒打背盐群众。群众们只得将盐巴放下，有的垂头丧气回了家，有的悄悄返回街上将郑松林狗仗人势、敲诈勒索的恶行告诉了留下来主持分盐工作的红军连长曾胜。

曾连长听完群众反馈，深知不严惩郑松林，开仓分盐的计划将毁于一旦。于是派出红军战士化装成背盐老乡向盐号走去，路途中将持枪抢盐的盐防军就地击毙。郑松林连忙指挥残部向山腰溃逃。这时候，埋伏在山顶和对面场口上的红军战士一齐向盐防军冲去，匪兵伤亡惨重，只得放下武器，举手投降。郑松林眼看大势已去，连爬带滚往山沟里逃，逃窜过程中被群众狠狠一斧结束了生命。

开仓分盐整整持续了三天三夜，直到六十多万斤盐全部被分给群众，负责分盐的红军部队这才渡河东去。

长坝槽击落敌机

在赤水河中游两岸，分别是贵州茅台镇和四川茅溪镇，茅台镇的元木岩村与茅溪镇的九坝村接壤地，有一个横跨两省的地方叫陈胡屯，山脚属贵州管辖，老百姓唤作陈胡屯脚脚；山顶属四川管辖，唤作陈胡屯坳坳。1935年3月，红军三渡赤水后，在陈胡屯这个“弹丸”之地，与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

3月16日18时，军委颁发了《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我野战军决于今16晚和明17日12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军委的渡河部署，严密规定了过河时间、过河后行走路线、隐蔽休息地点和警戒方向等，是一份周密细致、精心安排的行动部署。红军主力于3月16—17日分别从茅台渡口、草帘溪渡口和鄢家渡渡口渡过赤水河，进入四川古蔺县境内的水口寺、两河口和石宝寨隐蔽待命。从渡河时间上看，红军是罕见的、高调的白天渡河，按照军委的命令，过河后并没有走，在古蔺上述地区的山沟丛林里隐蔽休息，是一次“假走真隐”的全军大佯动。

红军主力过河进入四川，陈胡屯是必经之地。3月17日，红军在陈胡屯的青杠林里隐蔽休息。国民党的3架飞机尾追侦察，

飞机的低空飞行惊吓了红军的战马，马匹嘶吼跑动暴露了红军的行踪，敌机接连投下数枚炸弹，90多名红军战士牺牲在陈胡屯坳坳。同时，炸弹还炸死驮马6匹，烧坏部分苏维埃币、洋油滑油等军用物资以及村民住房。以陈胡屯坳坳为中心，方圆60平方公里的范围都成为敌机密集轰炸的重点区域。

3月18日，红军行至长坝槽。长坝槽距离陈胡屯10多里路，是当年红军三渡赤水从茅台往石宝进军的必经之路。这时，3架飞机再次前来轰炸，战士们气得个个咬牙切齿，义愤填膺，纷纷向担任警卫营机枪连连长的叶荫庭请战。然而，打不打飞机，事关中央纵队目标暴露与否。按规定，必须按总参谋部的命令执行。

这时，警卫营营长杨梅生风风火火地赶到机枪连，向叶荫庭传达了总参谋部的命令：“迅速占领阵地，痛击国民党飞机，掩护中央纵队安全前进。”

“是！”得到总参谋部命令的叶荫庭，迅速指挥机枪连，在长坝槽山上架起经他改装的4挺机枪。长坝槽溪深林密，两面都是崇山峻岭。叶荫庭仔细观察地形和国民党飞机盘旋的航线，指着附近最高的一棵树，命令道：“以这棵树为火力中心，一排的2挺高射机枪，东西隔25米，二排的2挺高射机枪，南北相隔10米，马上做好战斗准备！”

4名射手都是班、排干部，为了更有效地发挥火力，叶荫庭亲自操起其中的一挺高射机枪。通过“偏偏簧”，看到国民党飞机

已进入预定目标。这时观测员举着测远器喊道：“敌机高度 180 米，速度 70 米/秒。”“打！”叶荫庭发出一声斩钉截铁的怒吼。“哗——”一道火网喷薄而出，4 挺高射机枪共射出子弹 85 发。刹那间，天空爆发一声巨响，叶荫庭定神一看，好家伙，一架敌机冒着浓烟，翻滚着向下沟李孝沟方向悲鸣而落。另外两架敌机见势不妙，仓皇而逃。

当晚，总政治部派 4 位同志到警卫营驻地慰问表扬。

3 月 19 日，军委纵队在大村宿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向军委警卫营表示祝贺：“你们打得好，打掉了敌机的威风。现在，不再是我们怕敌机，而是敌机怕我们了。你们要好好总结经验，向其他部队推广。”

4 月 5 日，红军机关报《红星》第 13 期第 2 版对击落敌机的事件作了报道，并配以漫画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红军打下敌机后的兴奋心情。文章写道：“捷报，本月 18 日，蒋敌黑色大飞机一架低空飞至长坝槽，被我警卫营防空排射弹八十五发，击落在茅台附近。”这一消息传开后，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士气。

红军长征期间，国民党军共投入 200 多架次飞机参加战斗。长坝槽击落的敌机是红军长征中击落的第 3 架敌机。尽管红军没有专门的防空武器，但依靠简陋的步枪、机枪等，在战斗中痛击了国民党嚣张气焰。

塔子山下架浮桥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决定强渡嘉陵江，苍溪和阆中两县交界的塔子山下的塔山湾成为渡江的主渡口之一。塔子山沿江一侧地势陡峭，便于发挥火力；后山低缓，林密树茂便于疏散隐蔽；江面较窄，水流平稳，便于架设浮架。对岸河滩开阔，驻守着四川军阀田頌尧的一个营，该敌曾多次被红军击溃，军心涣散，士气低落，是薄弱易打之敌。

3月24日中午，嘉陵江上游沉寂的大山里，一支300多人的队伍匆匆行走着，带队的是川陕总工会副委员长白文龙。他们接到上级命令，迅速赶往距苍溪县城20公里的嘉陵江支流东河岸边的王渡场造船厂，协助等候在那里的红军架设浮桥，保障红军主力渡江。当时，造船厂聚集了通江、南江、巴中、达县、苍溪等县的木工、铁工、船工300多人，赶造的75条“毛蚌壳”小船，以及可供3座浮桥用的铁构件和大批渡江器材也已准备妥当。次日下午日落时分，当白文龙率队赶到时，离红军主力部队渡江的时间还有3天，大家必须尽快将“毛蚌壳”和渡江器材运往位于塔子山下的主渡口。

一条“毛蚌壳”少说也有数百斤重，一路上还要爬四五百米高的凉风垭，加之山上杂草丛生，道路早被遮掩，路旁的沟谷深不见底，因此把这75条“毛蚌壳”、3座浮桥的铁构件及大批渡江器材从塔子山下运到30里外的渡口去，困难可想而知。

3月26日傍晚，太阳被山林吞没，抬船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战士们用肩扛、用手抓，衣服撕烂了，皮肉破了，但没有人叫苦，也没有人抱怨，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不管怎样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路上，战士们还开起玩笑鼓劲：“我活了20多年了，只看到过水里行船，还从没见过山上也开船，这可是天底下独一无二的事了。”“是啊，不光是船在山上走，还在我们肩膀上走，这可是我们的福气呢！”3月28日黎明前，战士们硬是手抬肩扛地把“毛蚌壳”、浮桥的铁构件及大批渡江器材运到了塔子山后的隐蔽地带，而战士们却一个个累得像散了架。

3月28日夜，塔子山强渡嘉陵江的战斗打响，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乘船向对岸划去，紧接着隐蔽在山后的迫击炮一齐向对岸猛烈轰击。红军很快就渡过江并突破敌人的江防阵地，并乘胜猛追败退的敌军。这时，总指挥部发出立即架设浮桥的命令。架桥行动开始后，白文龙带领战士们迅速来到江边，但大家一看却全都傻眼了，只见河滩上除了细细的河沙，连石头都找不到，更别说是树了，怎么拴绳子？怎么连接两岸？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白文龙焦虑地低着头来回走着。这时一位老船工指着不

远处的山脚对白文龙说：“我们可以把那边的石头全搬过来，垒在一起，就可以拴绳子了。”事不宜迟，说干就干，一声令下，战士们以班为单位，马上就动手搬运石头。俗话说人多好干事，没多久工夫，沙滩上就垒起了高高的石头堆。

架桥开始了，白天看似波平浪静的嘉陵江，到了夜晚却是暗流汹涌，放到江面的木船，很快就被冲到岸边。江水奔腾呼啸，妄图将英勇的红军战士吞噬，战士们却毫不畏惧，纷纷跳进江里，顶着疯狂肆虐的风浪，扶着船向对岸游去，他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浮桥架设好。晚9时，桀骜不驯的嘉陵江水被红军战士们驯服，3座浮桥直插江对岸。浮桥在江水里宛如3条巨龙，兴奋地摇头摆尾，红四方面军主力从浮桥上源源不断向对岸进发。与此同时，红军在其他渡口也相继发起攻击，击溃守敌后渡过嘉陵江，向剑阁、江油一带挺进。

红军主力部队全部渡江后，白文龙带着300多名战士跨过浮桥，他们斩断绳索，再望了一眼河对岸的家乡，踏上了举世瞩目的长征之路。

拌桶作船巧渡江

1935年4月初，田野间的油菜花已渐渐凋谢，红四方面军在强渡嘉陵江后，势如破竹，迅速占领彰明及涪江以东大片地区。国民党军队沿岸布下重兵，并将所有渡船搜刮焚毁或沉入江底，企图凭借宽阔湍急的涪江天险阻挡红军前进。

红九军二十五师肩负着攻克江油县城的重任，红九军军长何畏主张从江油城南5里外的一处滩头蹚水过江。他找来一位当地老乡做向导，命令红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副团长石志班带领五连试渡江。起初，江水仅及腰深，但行至中流，水流陡然加速，如脱缰野马般奔腾不止。战士们手挽手向前推进，却被急流冲得东倒西歪。转眼间，两个排的战士连同随行营教导员、向导都被卷走，石副团长急忙下令撤退。这次教训让红军意识到，蛮干只会徒增伤亡，必须另寻巧计。

该怎么办呢？望着奔腾的江水，战士们一个个愁眉紧锁，无可奈何。忽然，传来一阵小孩子的哭喊声，红军便分头寻找，这时又听见咚咚咚的敲打声，像是敲打木头的声音。环视四周之后，战士们注意力放在了地上倒扣的“拌桶”（四川农村打谷工具）上，

走上前去掀开一看，两个小姑娘在里面哭个不停。原来他们在玩捉迷藏的游戏，但天色已晚小伙伴都回家了，却忘记叫她俩。一名战士为哄小孩子不哭，也钻进拌桶里，突然脚下一滑，整个人摔了下去，战友们赶紧翻进拌桶去扶他。这时不知是谁冒了一句：“想不到这拌桶能装这么多人，都可以当船使了。”

办法有了，战士们立即行动，砍来杉木条和竹条作绳索将拌桶固定，再以桐油混合石灰填补缝隙，制成 10 余只简易的“船”。每只船可载几十名战士，虽显拥挤，却解决了无船可渡的燃眉之急。3 日后，红七十三团团长李明亲率一连试渡。他们选择在彰明方向与塔子山相对的江心沙滩处启航，此处江面较宽，水流稍缓。第一船成功抵达对岸后，李明迅速布置滩头阵地，又返程组织第二渡顺利过江。然而后续船只多数被急流冲至下游沙滩，团教导队等部队被困江心。

已渡江的战士在李明指挥下向前推进，迅速占领河滩阵地，并与守军展开激战。敌军顽强抵抗，红军进攻受阻，而对岸的部队因缺乏渡江工具无法增援，形势危急。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三连排长自告奋勇地指着远处河对岸说：“我去把对门那只渡船弄过来！”话音刚落，人就不见了，如游鱼般悄无声息地接近敌控渡口。不一会儿，只见江面上冒出半个脑袋，他从水下用头顶动渡船，巧妙避开敌军哨兵，乘着夜色将船顶了过来。原来这名排长是有名的“水猫子”，不仅水性好，撑船的技术也不赖，有了这

只真正的渡船，他往返穿梭，将困在沙滩上的部队一船一船运过江。与此同时，当地苏维埃动员群众打捞沉船、赶制木筏，并协助红军用篾绳横江拉系拌桶和船只，上铺木板搭成浮桥。当夜，红军主力如潮水般涌过涪江。

渡江后，红军直指南塔坡——武都镇的制高点。敌军一个团据险固守，机枪火力封锁上山道路。先头部队3次强攻未果，李明便带领由班长以上骨干组成的教导队发起突击。这些战士每人配备冲锋枪和部分驳壳枪，在机枪掩护下如利剑出鞘，一举攻克山顶。战斗持续至下午，敌军反扑10余次均被击退。红军歼灭邓锡侯部第四旅一个团，残敌缩回江油城内。江油人民的母亲河涪江，成为了红军的智慧与勇气的见证。

红军菜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20岁出头的旺苍贫苦农家子弟朱荣在红三十一军医院担任看护。两个月后，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8月中旬，部队遵照党中央北上方针，从毛儿盖、卓克基等地出发，踏入了茫茫的松潘草地。出发前每人携带的干粮本就有限，缺乏草地行军经验的战士们，起初每顿只敢吃一小搪瓷碗，后来缩减到半碗，可即便如此精打细算，也短短几天就断粮了。

部队穿行的藏族聚居区，百姓多以游牧为生，少量种植的青稞尚未成熟。受反动派欺骗宣传，藏民们早已携粮带畜躲进深山，空荡荡的村寨无法解决部队的粮荒。“目前没有粮食的困难是暂时的，走出草地就是胜利！”医院院长的动员让饥肠辘辘的战士们重新振作，他还反复强调，即便群众不在场，购买粮食也必须严守纪律、照价付款。

征粮的队伍满怀希望出发，却在青稞地里犯了难——青稞还是青绿色的，籽粒饱满的白浆一搓就溢。为了活下去，大家只能忍痛收割，每割一片就埋下相应的白洋，插上写有“××××部队在

此买粮××斤，折白洋××元”的木牌，生怕多拿群众一粒粮食。这些带着青涩气息的青稞，被战士们用火烤、用脸盆炒、用搪瓷缸煮，勉强填了填肚子，支撑着部队走到了草地中心的阿坝。

过了阿坝，连未成熟的青稞也难觅踪迹，野草成了唯一的食物来源，但有的吃下去就会拉肚子、浑身发肿。可是这样的“口粮”，也只有先头部队能勉强找到。朱荣和战友们开始想尽一切办法求生，马鞍子、皮带，凡是能入口的都成了救命粮。他没有皮带，却珍藏着一块行军途中捡到的半新牛皮，本想做成草鞋耐磨，可饥饿实在难耐，便把牛皮割成细条，火上烤得焦黑，再用搪瓷缸煮熟，边走边嚼。等牛皮条吃完，就把皮鞋底也拆下来煮着吃了。

靠着这些“特殊粮食”，部队艰难走到黄河上游的噶曲河，眼看就要走出草地，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却让所有人陷入绝境。他违抗党中央北上方针，率领红四方面军掉头南返阿坝，这一举动让本就粮断草绝的部队雪上加霜。长途行军的疲惫与饥饿如影随形，战士们个个面黄肌瘦，连走路都摇摇晃晃，绝望的情绪在队伍中蔓延。

就在这时，希望意外降临。一天，朱荣和几名护士上山砍柴，准备给伤病员烧点开水，忽然撞见一只野羊。几人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包抄过去，硬是徒手将野羊逮了回来。这个意外的“战利品”让整个医院沸腾了，战士们七手八脚地杀羊、剥皮、切肉，

把洗脸洗脚两用的盆子当成锅，架在火上煮起了羊肉。没有盐巴，没有任何调料，可那鲜香的滋味，成了战士们长征路上最美的盛宴。“环境这样艰苦，我们还能打牙祭，真是不容易哦！”护士李清边吃边感慨。护士长则细心地叮嘱大家多喝汤，把剩下的肉留着当干粮，还特意分出一份给院长送去。“嗨，你们这些小鬼真有办法呀！还举行会餐了？”院长欣慰不已，“就是要这样想办法克服困难，我们工农红军就是在困难中成长起来的！”

青涩的青稞、苦涩的野草、焦黑的牛皮、难忘的野羊，成为长征路上的“红军菜”。在松潘草地这片“绝境”之中，红军战士们凭借坚定的信念、钢铁般的纪律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用双脚丈量了这片死亡之地，书写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红军桥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为策应北上的中央红军，打过嘉陵江后，挥师西进来到江油。红三十军的一支部队在二郎庙镇青林口驻扎约一个多月，他们在这里宣传革命道理，领导贫苦民众打土豪、分田地，创建苏维埃政权，和广大劳苦大众亲密相处，建立了密不可分的鱼水深情。

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了，红军为执行战略大转移，不得不离别这块美丽的土地。老百姓扶老携幼、拦道相送，刚强的红军战士依依难舍、挥泪上路。但妇女独立团一位20多岁的刘连长因重病缠身，无法随军转移。部队决定让她留在一名姓杨的老大娘家里治疗调养。

杨大娘孤身一人，以卖棉线为生，每月所得仅可勉强糊口。红军来后打土豪、分田地，穷苦人民翻了身，孤寡清苦的杨大娘备受红军照顾。她对红军有着极深的感情，将刘连长接回家后，关怀爱护备至，精心为她护理、调养。她俩同吃同住，亲如母女。七八天后，刘连长身体渐渐康复，但红军大部队已经走远，只得暂住下来寻找机会与部队联系。

红军一走，反动派还乡团便杀了回来。他们穷凶恶极，不问青红皂白，就对流散红军、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施以酷刑，进行血腥屠杀。伪联保主任得知杨大娘家中住有一个外地口音的陌生女人，便暗中查访，恰遇坏人告密，得知其为红军妇女独立团的连长，便决定立即捕杀。

5月下旬一个漆黑的夜晚，破旧狭窄的街道上忽然传来一阵阵凄厉的犬吠。杨大娘与刘连长刚刚解衣上床，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便是蛮横的撞门声。杨大娘感觉情况不妙，忙叫刘连长躲在隔壁柴房里，准备独自上前开门应付。谁知团防分队长率领的10余个歹徒已破门而入，凶神恶煞地吼道：“快把女红军交出来！”大娘毫不胆怯地迎上前道：“你们走错门了吧，我家哪有什么女红军？”站在前面的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不由分说，一拳把大娘打倒在地。团防分队长举起大砍刀恶狠狠地说：“快交出人来，不然我一刀劈了你！”躲在柴房里的刘连长怕大娘遭害，毅然走了出来：“你们要抓的是我，欺负一个孤老太婆算什么本事？”这伙歹徒被她镇定自若的神态愣住了。隔了半晌，团防分队长才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带走”。

第二天上午，刘连长被押赴刑场。她昂首阔步，视死如归，行至青云溪合益桥头时，突然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工农革命胜利万岁！”三声枪响，她倒在桥面上，鲜红的血水浸透青石板缝，滴入青云溪。那一刻，日头隐入

云层，溪水呜咽着打转，溪边的杜鹃花垂下了头，仿佛在为这位无名英雄哀泣。

乡亲们含泪将她安葬在桥畔，没人知道她的全名，只记得她曾是青林口的亲人。他们常常在桥边驻足，把她的故事藏在心底，代代相传。

解放后，合益桥正式更名为“红军桥”。桥栏上的石刻标语历经风雨冲刷，至今仍清晰可辨；桥下的青云溪依旧流淌，仿佛在诉说着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傈傈族同胞带红军过南山

傈傈族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德昌南山是傈傈族的传统聚居地。这里地势东高西低、沟壑纵横，土地梁梁等山梁海拔超过 2600 米，交通闭塞。民国时期，德昌傈傈族群众生活贫苦，绝大多数是汉族地主的佃户，还要承受土司、土目的残酷剥削，需缴纳鸦片、“孝顺银子”，并自带武器服兵役。长期的压迫让傈傈族群众对压迫者充满抵触，而国民党军队的横征暴敛更让他们苦不堪言，

1935 年 5 月上旬，中央红军抵达会理进行短暂休整，继续移师北上。德昌作为川西南的重要节点，是红军北上必经之地，国民党军队为阻拦红军，在德昌乐跃、半站营一带布下严密防线，意图凭借安宁河天险和山地优势堵截红军。南山傈傈族聚居区因地处交通要道，成为双方博弈的关键区域。

早在几天前，德昌区保安队就带着土门子童家民团的团丁钻进了南山村寨，把枪口对准了这条必经之路。保安队长还要求傈傈族头领张万顺，凑足 60 个汉子，去土地梁梁挖路坑、布竹签、安弩箭，埋伏红军。傍晚时分，正当张万顺犯难时，住在土地梁

梁南面的傣傣汉子纪老大，气喘吁吁跑过来告诉他：红军已到了他住的村寨，纪律严明，对人和气，不吃、不拿老百姓的东西，是穷苦人的队伍；红军是借道过路，去打国民党、打老财的。纪老大的话像一颗定心丸，打消了张万顺的顾虑，他当即拍板，决定帮助红军通过南山。张万顺让纪老大赶快把红军带上南山，自己则去说服保安队长离开土地梁梁。他找到保安队长，装作恭顺的样子说：“头领，土地梁梁这边山陡路窄，我们傣傣人熟门熟路，由我们守着最稳妥。你们去干海子那边堵，那边路宽，红军容易突围！”保安队长没多想，带着团丁就往干海子去了。

天还没亮，南山的林间只有虫鸣。张万顺带着傣傣汉子们扛着锄头、砍刀，借着月光抓紧填路坑、拔竹签、收弩箭，不一会儿就把埋好的陷阱全清干净了，又悄悄撤到山林两侧，给红军让出了一条畅通的路。半夜时分，纪老大带着红军队伍悄无声息地摸上了南山。刚到山腰，一小股留守的敌人突然开火，红军战士迅速反击，几声枪响后，保安队长和两个兵丁倒在地上，另外3个也被打伤。驻扎在天阳坪的民团听说队长死了，吓得丢了枪，一溜烟跑没了影。红军没费多大劲，就顺利穿过了南山核心区。

另一边，另一支红军从乐跃西面的老鸱沟翻山，半夜赶到了稀泥沟傣傣村寨。傣傣人张聋子和几个村民察觉到动静，以为是敌军来了，慌慌张张躲上了竹楼。红军战士进屋查看，用手电筒照见他们，连忙压低声音喊：“老乡，别害怕，我们是红军，不

伤害老百姓！”说着把他们请下竹楼。有村民假装肚子痛想躲着他们，红军战士立刻掏出随身携带的药，递上温水，耐心安抚。

那天晚上，几百名红军战士没有进一间村民的屋子，全都在露天坝里和衣而睡。战士们向村民买了大米、腊肉、鸡蛋当口粮，每一样都按市价留下了银圆，还在装银圆的布包里夹了感谢的字条。第二天一早，红军请张聋子等人带路下山，并给每人塞了半个银圆当酬劳，才沿着河西的小路，向德昌城奔袭而去。

可红军走后没几天，尾追的国民党中央军就闯进了德昌。一部分士兵借着“搜查红军”的名义，冲进南山傈傈村寨，放火烧房子、抢粮食和财物，村寨里顿时鸡飞狗跳，哭声震天。傈傈族同胞再也忍无可忍，在领头人一美扒的带领下奋起反抗。一美扒端起猎枪，瞄准敌军的机枪手扣动扳机，“砰”的一声，机枪手应声倒地，敌军的气焰瞬间被打了下去。剩下的敌军抬着伤兵往土门子逃，傈傈族同胞一边追赶一边又打死2个、打伤3个敌军士兵。国民党中央军吓得狼狈地撤离了南山。

红军军刀

1935年5月13日，红军已到会理摩挲营的消息传到永定营（今德昌永郎镇），不少人造谣，说“红军来了要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抓丁拉夫”，永定营的老百姓都慌了。村民沙洪太是回族，对红军也不了解，便带着家人和乡亲们一起躲进了山里。

5月14日天黑后，从会理摩挲营赶来的红军先头部队，和镇守永定营的国民党团丁短暂交火后，就击溃了团丁、占领了镇子。第二天，红军大部队陆续赶到，街上、院坝、庙子里到处都是红军，沙洪太家里也住进了队伍。

等红军走了，沙洪太带着家人回到家，发现屋里一切完好，唯独堂屋神桌上多了一样东西——一把马刀、三个光洋，下面还压着一张字条。家人都不识字，赶紧拿着字条去找保长撒丙才。撒丙才看完说：“这是红军的道歉条，他们一开始不知道你家是回族，在这儿煮了猪肉，还砍坏了菜刀。后来有文化的红军看到中堂上的回文，才知道弄错了，特意留条赔礼，马刀和光洋是赔损失的。”末了，保长又补了句：“不过红军的东西不能留，得上交。”

沙洪太看着那把马刀，心里实在喜欢，又念着是红军给的，迟迟没上交。后来保长问起刀的事，他便装糊涂：“哎呀，我这记性太差，早把这事忘了！那刀好些天前就不见了，说不定是娃娃拿去玩丢了，要是找着，我肯定送来。”打那以后，沙洪太就把马刀悄悄藏了起来，再也不提这事。日子一久，保长没再追问，这把刀才算保住了。

这把从永定营沙家留下来的红军刀，后来从沙洪太传到儿子沙志全，再传到孙子沙开华手上。1974年，33岁的沙开华做了个决定，把刀捐献给国家。他说：“靠这个物证，能让更多后人知道红军纪律严明，懂得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记得他们友爱平等的革命风范，让子孙后代继承红军的优良传统，当好革命接班人。”

险途上的战略抉择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在巧渡金沙江、召开会理会议后继续踏上北上急行的征程。这支长期遭受国民党军追击的队伍深知前路艰险——天险大渡河横亘前方，蒋介石亲赴昆明部署“大渡河会战”，妄图将红军复刻成石达开第二。经毛泽东提议，中革军委任命熟悉川军和当地情况的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率队探路。5月19日拂晓，先遣队从礼州出发直插冕宁方向，当日便抵达冕宁城南32公里的泸沽镇。

泸沽，古称台登，汉代便设县治，是安宁河谷通往大渡河的二岔咽喉要道，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历史上，司马迁、司马相如出使西南的身影也曾定格于此，宋末蒙古铁骑、明初蓝玉大军曾踏过此地，石达开的太平军也在此留下徘徊足迹。只是此刻，这座古镇没了商旅喧嚣，唯有红军侦察兵的急促脚步声——先遣队刚扎营，便即刻派出侦察组向越西、冕宁方向探路。此时，中共冕宁地下党组织派人赶来接应，向红军汇报当地情况，给疲惫的队伍带来了关键信息。

5月20日下午，朱德的电报准时送达，“据报泸沽、越西均

无敌，冕宁有少数敌人”“一军团之第一团随刘、聂明日向登相营、越西前进。无敌情要走 20 里左右。第五团由左（权）刘（亚楼）指挥，为第二先遣团。亦带电台暂随第一团后跟进”。军令如山，但刘伯承和聂荣臻却陷入沉思。侦察组传回的消息与电报内容相互印证，也抛出了关键抉择：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一条是通往雅安、成都的大道，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渡河即进入富林，路面平坦、补给便利，却是国民党军重点防御方向，沿途各要地均有重兵扼守；另一条是藏在深山的小路，经冕宁、大桥镇、拖乌直达安顺场，山路崎岖难行，且要穿越百里彝族聚居区——在统治阶级长期的压迫下，彝汉矛盾深重，这里早已成为汉人军队的“畏途”，但国民党军防御力量相对薄弱。两条路，恰似两条命运线，摆在先遣队面前。

就在刘伯承、聂荣臻反复斟酌之际，地下党员邓明鸿和进步青年李发明、向德伦、吴兆理等人，受冕宁地下党负责人陈野苹、廖志高的派遣，分两路沿安宁河两岸南下接应红军。4 人分别到了泸沽和松林，先后向先遣队汇报了冕宁党组织的情况，以及从泸沽到大渡河的两条行军道路的里程、敌情、民情、给养等详细情况。这是地下党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收集的情报，字字千金。

结合地下党情报与侦察组报告，刘伯承、聂荣臻迅速研判：大渡河沿线，川军第二十四军第四旅防守泸定至安顺场一线，第

五旅扼守安顺场至富林一线，川军第二十一军王泽浚旅正星夜增援富林，即日便可抵达；通往雅安的大道沿线，更驻扎着刘湘的重兵。恰在此时，红军截获并破译敌人“重庆 17 日专电”，电文明确暴露其判断——认定红军会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已将此处打造成防守重点。

“敌人以为我们会走大路，我们偏要出其不意！”刘伯承与聂荣臻迅速达成共识：避实就虚，主力改走冕宁至安顺场的小路；同时将计就计，由左权、刘亚楼率领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先遣二团按原计划向越西佯动，大张旗鼓营造主力将从大树堡渡河的假象，迷惑牵制敌人。方案既定，他们立即向中革军委发电请示，可因中革军委正处于行军状态，电波在群山间穿梭，迟迟未能收到回应。

时间不等人，敌人增援部队步步逼近。刘伯承与聂荣臻当机立断：兵贵神速，先行动再等待批复。5月20日晚，夜色如墨，先遣第一团在进步青年李发明、向德伦的向导下，悄无声息向冕宁县城开拔。

5月21日凌晨，冕宁县城迎来了曙光，也迎来了红军先遣队。街头早已贴满了“欢迎红军”的标语，居民们红灯高悬，用最朴实的方式迎接亲人。当天下午5点30分，当先遣队行进到冕宁县城以北40华里的大桥场时，电台终于传来了中革军委同意刘、聂决定的急电，让所有人悬着的心落了地。

一枚红军证章背后的生死营救

1935年5月27日下午，红军第九军团在冕宁县的泸沽镇梳妆台同国民党二十四军激战一场，高奏凯歌的红军急于北上抗日，马不停蹄地向冕宁方向进发。大部队走后没多久，一位红军战士突然闯进了王成国家的大门，焦急地向主人恳求：“老板，我是红军，白军在后面追我，我在你家躲躲好吗？”老王没有丝毫犹豫，连连点头：“好！好！”红军战士敏捷地绕到屋后，跳进了猪圈里。王成国刚刚轻轻掩上猪圈，大门就哐啷一声被撞开，两个凶神恶煞的国民党兵闯了进来。

“快把共匪交出来！”国民党兵厉声喝道。

“今天我们爷俩一直在家，哪儿有什么共匪啊！”老王镇定地回应。

“私通共产党是要杀头的！主动交出来，保你们平安无事，还大大有奖！”另一个国民党兵威逼利诱。

“这些我们都懂，可今天我们连苍蝇蚊子都没见一个啊！”老王始终不肯松口。

“少废话，搜！我们追着追着就不见了，难道他会上天入地

不成？”一个尖下巴、刮骨脸、带着几分官气的国民党兵气急败坏地吼道，还狂叫着要把老王拉出去枪毙。儿子王仕祥拼命护住抱着柳树的父亲，向国民党兵求饶，不料被一个兵用枪托重重打翻在地……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几位从冕宁县泸沽镇关索城冲过来的红军战士赶到，把敌人赶跑了，一直追击到孙水河边才消失。

敌人逃走后，老王才回过神来，悔恨交加地对儿子说：“我们真糊涂，被这几个乌龟王八蛋弄得晕头转向，怎么就没向赶来的红军同志报告家里还藏着一位红军战士呢！”稍作平静后，老王关好大门，径直走到猪圈边，轻声探问：“先生！先生！没事了，你快出来吧。”父子俩把这位瘦高个子红军拉了上来，帮他洗澡、换衣、准备饭菜。趁着烘烤红军战士洗干净的军服、军帽的间隙，三人商量起了与敌人周旋的办法，最终决定把红军战士扮成农民，帮他寻找大部队。

三人亲切地聊了起来，老王问：“贵姓？”“贱姓陈。”红军战士答道。“名字呢？”红军却笑而不答。当谈及身世时，他从军服里取出一枚圆形银板，上面刻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集团军外出证章”字样。战士庄重地向王家父子行了个军礼，把证章郑重地交给老王，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

为了让红军战士的农民装扮天衣无缝，王家父子颇费了一番心思。当天细雨霏霏，瘦高个子红军战士化装成了割草的农夫，

老王则扛着一把“看水锄”，陪着这位“农夫”摸黑离开了家，后来在一位 60 来岁老人的指点下，终于找到了红军大部队的驻地高枳槽。

完成任务后，老王与红军战士依依惜别，扛着锄头、披着蓑衣，背上那个看似装满野草、实则藏着红军赠送食品的大竹篮，安全回到了家中。一进家门，老王就找来一小块黄布，把那枚证章小心翼翼地包好，藏在了常人难以察觉的地方。王成国老人一直惦念着那位神采奕奕、可亲可敬的红军陈同志，但直到 1939 年 5 月弥留之际，也没能等到这位红军同志的音讯。而那枚证章，如今静静地陈列在纪念馆里，向人们讲述着营救红军战士的生动故事。

红军医术传藏家

1935年5月29日，最后一批撤离越西县城的红军，沿零关古道向北疾行，追赶主力部队。午后时分，队伍行至普顶杠子小干沟附近，突遭土匪冷枪袭击。一名红军医生腿部中弹，失足滚落10余米深的山涧树丛，当即昏迷过去。战友们搜寻良久无果，奈何军情紧急、追兵逼近，只得含泪继续赶路。

夕阳西沉，暮色渐浓，昏迷的红军医生缓缓苏醒。他强忍剧痛，察觉大腿骨已然断裂，伤口仍在渗血。危急关头，他凭借行医经验，嚼碎身边止血草药敷于伤口，而后艰难地向山道方向挪动。待爬到路边，却只见空寂山道，部队早已不见踪影。他担心再遭土匪毒手，便伏在路旁草丛中，静待夜色降临。入夜后，他咬紧牙关，拖着伤腿，朝着附近的小干沟村艰难爬行，身后的泥土上，留下一串斑斑血迹。

小干沟村是彝藏杂居的村落，20余户人家皆是穷苦百姓。约莫夜里10时，红军医生终于爬到村民王里日家门前，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叩响房门。王里日是藏族汉子，通晓彝、汉、藏3种语言，家境清贫。听到敲门声，他点燃松明火把起身开门，见

门前匍匐着一名浑身浴血的红军战士，不由得大为震惊。

红军医生用微弱的声音表明身份，称自己是江西籍红军，因腿部重伤无法行动，恳请收留。此前，王里日曾亲眼看见红军为老百姓办实事的种种善举，深知这是一支为穷苦人谋福祉的队伍。他当即俯身扶起红军，坚定地说道：“你莫要着急，安心住下，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一口饭吃！”说罢，他将红军抱进屋内，点燃火塘煮起洋芋，又烧来热水，小心翼翼地为红军擦洗伤口。当看到红军腿骨外露的惨状，王里日又急又怕，既忧心无钱无药医治，又唯恐辜负了红军的信任。

见此情形，红军医生反倒宽慰起王里日：“老乡莫慌，我本身就是军医，认得治疗枪伤、骨折的草药，还能教你辨识采药，日后也好为乡亲们祛病疗伤。”次日一早，王里日便依照医生的指导，找来木板为其固定断腿，又将医生稳妥绑在背架上，悄悄背到屋后深山之中。采药途中，医生手把手教他辨识草药、讲解药性配伍，同时还向他宣讲共产党的政策，告诉他红军打仗就是为了让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医术不分亲疏，学会了就要多为周边的彝藏乡亲解除病痛，让大家都能不受疾病折磨。王里日听着这些暖心的话，更坚定了学好医术救助百姓的决心，学习起来愈发用心，不过数日便掌握了大半要领。

采回草药后，医生又指导王里日按方配比，将草药捣烂敷于伤口，再挑选对症草药熬制成汤药。为了让医生早日康复，王里

日不惜宰杀了家中仅有的老母鸡炖汤，还把平日里舍不得吃的燕麦糍粑、蜂蜜尽数拿出来，全家上下悉心照料，按时换药喂饭。7天后，医生的伤口开始愈合，长出新肉；12天后，他已能下地缓步挪行；半月之后，便可以拄着木棍行走了。

小干沟村地处偏远，国民党势力难以渗透。村民们得知红军医生在此养伤，皆默契地守口如瓶。在全村人的掩护下，医生安然养伤20余日，未受任何侵扰。伤口痊愈后，归队心切的医生向王里日一家辞行。王里日放心不下，担心他路况不熟再遇土匪，执意一路护送，直至海棠汉区大路才依依惜别。临别之际，医生掏出身上仅有的12块银洋相赠，王里日却坚决推辞，让他留作路上盘缠。医生眼含热泪，承诺革命成功之日定会回来探望，还写下自己的姓名与部队番号，遗憾的是，这张字条在解放前夕不慎遗失。

此后，王里日谨遵医生所授，采药配药为乡亲们诊治病痛，疗效显著。红军医术的美名很快传遍越西四乡，周边州县的患者也纷纷慕名而来。王里日还特意嘱咐儿子王吉哈潜心学医，誓要让这份红军医术代代相传。

岁月流转，90年光阴弹指而过。当年红军传下的医术，已在藏家薪火相传四代人，成为长征路上军民鱼水情深的珍贵见证。

飞夺泸定桥

泸定桥，即大渡河铁索桥，位于泸定县城西。桥以铁索系于两岸桥台构成，索上铺木板以通行。1935年5月29日黎明，红军夺取控制泸定城的制高点海子山，占领了泸定桥西桥头。

为防止红军渡过大渡河，国民党川军拆掉了桥板。泸定桥在10丈高空悬着，13根铁索寒光凛冽，像一道被抽去了筋骨的脊梁，横跨在咆哮的大渡河上。河水在脚下翻滚奔涌，撞出森白的浪沫，看一眼都让人头晕目眩。

河东岸敌李全山团周桂三营已在东桥头附近构筑了工事，并用重机枪、迫击炮不断向西桥头密集射击，仿佛织成一张死亡的火网。同时，位于柏秧林的敌李昭营，也用火力封锁红军从沙坝到桥头的通路。

红二师四团在沙坝的天主教堂召开了干部会，决定由红二连的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一个精干的夺桥突击队，由红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担任突击队长。同时，由红三连连长王友才带领三连担任一梯队，紧跟在突击队之后铺桥板，以便后续部队冲过去。下午4时，总攻开始。王开湘、杨成武在桥头指挥，全

团的司号员集中在桥头附近吹起了冲锋号，顿时，机关枪、迫击炮、手榴弹的爆炸声和呐喊声震天动地，打响了夺桥激战。廖大珠带领队员手持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 10 来颗手榴弹，冒着对岸射来的枪弹，扶着桥边的栏杆，踩着摇晃的铁索，向敌人冲去。王友才率领三连组成的一梯队背着枪，腋下夹着木板，紧紧地跟在突击队后面，一手抓着铁索链，边爬、边铺桥板、边冲锋。

就在突击队爬完最后一节铁索，几乎就要接近桥头时，西城门突然燃起熊熊烈火。原来，这是敌人的预谋！他们为了防止红军攻进城，事先用桥上抽下来的木板集中在城外，浇上煤油，一旦用水挡不住红军就用火。杨成武见状，站在西桥头振臂高呼道：“同志们，这是胜利的最后关头，拿出你们的勇敢精神，冲过去！莫怕火！冲呀！敌人垮了！冲呀！冲呀！”王开湘和身边的同志也齐声吼起来：“同志们，莫怕火，冲呀！敌人后退了！”“前进！”廖大珠突然一跃而起，带头冲进火海。他头上的帽子、身上衣服都着火了，但他仍不顾一切地向火里扑去。又一个突击队员冲过去了，他是个从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又一个、两个、三个……他们把手榴弹扔到敌群中间后，随着“啵啵”的爆炸声，一个个蹿过火舌，挥舞着马刀，杀向敌人。

紧接着，杨成武和红三连的战士一起在 22 名勇士后面一边铺桥板，一边向桥东冲去。桥板刚铺时，隔一步铺一块，人在上面走，下面的铁索猛烈地摇晃着，就像筛筛子一样。然而，谁也

顾不上这些。在红三连的后面，王开湘带领着二梯队像潮水般涌上桥头。此时，那 22 名勇士已经冲进城里与敌人作殊死搏斗。他们的子弹和手榴弹都快要打光了，敌人开始向他们反扑了。夜色降临，敌人抡起大刀，见人就砍，眼前一个黑影一个黑影地倒下去。就在突击队快支撑不住时，杨成武带着红三连赶到了，他们一阵冲杀，把敌人的反扑压了下去。巷战在泸定城的每个角落激烈进行，枪声、喊杀声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

终于，残敌溃散了，向城北逃去。一轮清冷的明月挂在天上，泸定城已牢牢掌握在红四团手中。硝烟渐渐散去，河水映照着斑驳的月光。那 13 根冰冷的铁索，静静横亘在大渡河上。突击队的 22 名勇士被集合起来，经清点，有 4 位同志，永远留在了这座他们用生命夺下的铁索桥畔。红军勇士们以血肉之躯，在枪林弹雨与熊熊烈焰中，打通了长征北上的关键通道。

胡长保舍身保卫毛主席

1935年6月4日清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纵队从泸定化林坪出发前往荣经黍子地，这段路程要走整整一天。出发时，毛泽东因有事务耽搁，未能赶上中央机关的队伍，便与卫生部的机关人员一同前进。

当时跟随在毛主席身边的，有警卫班班长胡长保和警卫员陈昌奉、吴吉清等人。一行人行至茶合岗山间时，3架敌机突然从空中俯冲而来，队伍只能迅速拉开距离，分散前进。胡长保走在毛主席前方，陈昌奉紧随毛主席身后。毛主席依旧埋头前行，神情专注，似在思考问题，只是偶尔抬头瞥一眼空中的敌机；而陈昌奉与胡长保几人，心中却始终紧绷着一根弦，时刻警惕着敌机的动向。

片刻后，敌机转向队伍后方飞去，大家紧绷的神经刚略微放松，突然听到背后上空传来两声刺耳的啸叫——陈昌奉立刻意识到炸弹即将落下，急忙大喊一声“主席！”随即朝着毛主席疾奔过去。瞬间，几颗炸弹便在他身旁及前方轰然爆炸。千钧一发之际，只听胡长保大喊一声：“主席！”，便猛地向毛主席扑去，把主席

推到了一边。随着“轰”的一声巨响，主席和胡长保都被浓黑的硝烟罩住了视线。

陈昌奉等人挣扎着从地上爬起，目光急切地在烟雾中搜寻，很快便看到毛主席正蹲在负伤的胡长保身边，轻轻地唤着“长保同志、长保同志！”周围的同志也都围了过来，看见胡长保躺在地上，双手紧紧捂着腹部，额头布满密密麻麻的汗珠，始终一声不吭，大家心里阵阵难过。

卫生员钟福昌匆匆赶来。毛主席语气急促地对他说：“快，给他上点药！”胡长保却缓缓向毛主席摆了摆手，脸色便变得像黄纸一般，气息微弱地说：“主席，我不行了……药非常珍贵，还是把它留下吧！”

“没关系，你会好的！”毛主席一边安慰胡长保，一边急忙协助钟福昌为他包扎伤口。包扎完毕后，毛主席坐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将胡长保的头托在自己的臂弯里，如同托着即将入睡的孩子，轻声说道：“胡长保同志，你不要紧，坚持一下，我们把你抬到黍子地，找医生治疗一下就会好的。”

躺在毛主席怀中的胡长保，双眼已有些失神，却依旧留恋地紧盯着毛主席，艰难地说：“主席，我不行了，最可惜的是，我不能跟您胜利到达目的地了！”说到这里，两颗亮晶晶的泪珠从他眼角滚落。他喘息了片刻，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仍坚

持着继续说：“我牺牲之后，如果可能，请您转告我的父母。他们住在江西吉安。”

毛主席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将胡长保抱得更紧了些。陈昌奉与钟福昌在一旁连忙安慰：“班长，你会好的，你会和我们一起长征的！”胡长保轻轻摇了摇头，目光转向警卫班的同志：“同志们，不要难过。……我不能继续保护主席了，你要好好地保护主席和中央首长啊！”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渐渐变得模糊不清。最后，他用尽全身力气抬起头，再次目不转睛地望着毛主席与众人，嘴唇微微颤动，一字一顿地说：“祝——革——命——胜——利！”话音落下，他的双眼便永远地合上了。

“班长，班长！”大家眼含泪水急切地呼喊，可胡长保再也无法回应。毛主席缓缓从胡长保的脖子下抽出手，将他轻轻放在地上，随后慢慢站起身，小心翼翼地把夹被盖在胡长保的遗体上。

那天的山间，一丝风也没有，山上的青草与树木静静伫立，仿佛也在为这位牺牲的烈士默哀。众人擦干眼泪，在掩埋了胡长保的遗体后，跟随毛主席继续踏上了北上的征程。

长征中的“隆中对”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后，于6月中旬从宝兴的硃碛村出发翻越长征以来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就在这时，先头部队收到了来自雪山那边的红四方面军的电报：“一、我们已派一小队向西南进占懋功与你们取联系。你之先头部队确取联系后，请即飞示以后行动总方针。我方情况请问我先遣之指挥员同志，即可得知大概也。二、川西一带情况有利于我们消灭敌人作战巩固之后方根据地……。国焘、昌浩、向前。六月二日。”来电如一阵春风，迅即传遍中央红军各部。6月12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给中央起草了《关于川西北敌我情况的报告》，详细介绍了敌方的部署、兵力、调动情况，汇报了红四方面军所属各部队的部署情况和战斗任务。次日，连同两幅地图，一起送往红一方面军，并称：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同志已来懋功，并带电台1架，在懋功之部队目前应如何配合兄方行动，请直接示之。

6月18日，党中央、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此前，李先念受红四方面军总部派遣，率领红三十军八十八师、红九军的一部已在夹金山北面的懋功一带接应。当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

朱德、张闻天等领导同志在一座法式建筑的天主教堂内会见了李先念。见到这么多党中央领导人，李先念的心情特别激动，也有一些拘谨。

毛泽东伸出他那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李先念的手，上下打量，亲切地问道：“先念同志，多大岁数，哪里人呢？”

李先念激动不已：“报告首长，我今年 26 了，湖北黄安的。”

毛泽东说道：“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我们的董老（董必武），是你的老乡喽。”毛泽东亲切的问候和对干部情况的熟悉程度，让李先念更加钦佩，心情也放松了许多。

接着，毛泽东询问红四方面军的情况，李先念做了客观详细的汇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对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同时充分肯定红四方面军的业绩。他说，过去两支红军独立作战，力量分散，现在好了，两支力量合在一起，我们的力量就更大了。

随后，毛泽东打开桌上的军用地图，边看边问：“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气候怎样？地形怎样？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怎样？还能不能再打回去？”

李先念从容答道：“岷、嘉两江之间地区，山间平坝子多，物产丰富，人烟稠密，居民以汉族为主，也有羌族和藏族，部队的给养与兵源都不成问题。从战略地位上看，东连川陕老根据地，

北靠陕甘，南接成都平原，可攻可守，可进可退，回旋余地大。红军如果进入这一地区，有了立足之地，可以很快休整补充，恢复体力，再图发展。趁现在茂县、北川还在我军控制之下，可以打回去，否则，再打过岷江就难了。”

毛泽东听得很投入，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李先念补充道：“我们来懋功的路上，人烟稀少，只看到少数藏族牧民，筹粮很难，大部队久驻无法解决给养。大小金川和邛崃山脉一带，高山连绵，谷深流急，大部队很难行动，不容易生根立脚。向西北去条件更差。”“依我看，无论从地理条件、群众基础，还是红军急需休整补充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前途看，两军会师后应向东北方向，首先是向岷嘉地区发展比较有利。”李先念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好！说得好，很有见解，真知灼见呀！”毛泽东对李先念大加赞许，“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相见恨晚喽！”

那天晚上，大家兴致勃勃，一直谈到深夜。不久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边的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向问题，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会上一致通过报告提出的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两河口欢迎会

1935年6月25日的懋功县（今小金县）两河口，晨雾还没散尽，东溪南岸的山坡上就传来了铁锹凿土的声响。西北的梦笔山还顶着残雪，东北的虹桥山隐在云层里，这片被群山紧裹的虹桥沟，红军战士出镇找了几里地，才勉强选定了一处斜坡作为欢迎会场地——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对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到来十分重视，专门指示总政治部在两河口镇外布置欢迎会场。

坡上的灌木比人高，乱石从土里拱出来，工兵连的战士们正弯腰清理。有人攥着斧头砍杂树，树干倒下时溅起的泥水顺着裤腿往下淌；有人用铁锹刨乱石，虎口震得发麻，却没停下手——“得赶在晌午前弄好！四方面军的同志要来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几十双眼睛都亮了起来。3个钟头过去，这片不到百米见方的斜坡变了模样，上方用土石垒出小小的方台，成了主席台；下方铺着松松的沙土，是欢迎队伍列队的地方；右侧凸出的平地被扫干净，司号员们已握着军号在那儿站定。会场东首数米处，两根干木横在路上方成了简易的欢迎牌，一些绿叶野花攒簇着、艳红的绸布上闪耀着“欢迎红四方面军同志”几个八分体字。镇内

外刷满了标语、口号，许多房屋前还挂起了红旗。欢迎会场简单又庄严热烈。

临时架设的电话线像一条银线，顺着山路往虹桥山方向延伸，5里外的守机专员攥着耳机，眼睛盯着远方——他得第一时间把四方面军到来的消息传回来。山坡下，欢迎的队伍渐渐站满了沙土区，千百双眼睛都盯着虹桥沟的方向，盼着远方探出的身影。

天忽然飘起了细雨，雨丝打在军帽上，战士们却没动。忽然，人群里有人低呼：“看西边！”所有人齐刷刷的向西侧转头——两河口的街口，一群人正朝山坡走来。走在前面的毛泽东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裤脚卷到膝盖，沾着泥点却依旧精神；紧随其后的朱德总司令，步子沉稳，军帽檐下的目光扫过队伍时，每个战士都下意识挺直了腰。毛泽东和朱德微笑着走过队列，像检阅士兵一样，最后在靠近虹桥山的地方停了下来。

雨忽然大了，豆大的雨珠砸在树叶上“哗啦啦”响，山间的水流顺着坡往下冲，刷走了地上的败叶和泥沙。战士们的外衣很快湿透，冰凉的雨水渗进贴身的单衣。不知是谁先起了头，“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的歌声顺着雨势飘了起来。先是几个人唱，接着是几十人、几百人，强渡金沙江的调子、遵义战斗的歌词，混着雨声在山谷里回荡，连东溪的流水都像是跟着应和。

“东方！有马头！”突然有人喊。战士们赶紧抬头，只见东侧

山脚的林隙里，几个马头慢慢露出来，张国焘及十余名骑兵飞奔而来。见到毛泽东等人出迎，他们纷纷下马，跑过来和前来迎接的党中央领导人握手、拥抱。久经患难，在川西北的一处小山村里重逢，情绪之欢欣难以形容。大家围上去，无数双手在雨里挥动，有人激动得红了眼眶，想说什么，却被涌到喉咙口的哽咽堵了回去。

“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口号声像暴雷似地炸了开来，拳头握得紧紧的，如同几千个铁锤，随着每句口号一起举起来，要戳破低空的云层。雨声、军乐声、暴涨的溪流声混在一起，织成震耳的交响曲，把一行人迎上了主席台。

口号声停了，山坡上静得能听见雨打地面的声响。朱德总司令站在方台上，掷地有声：“同志们！……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欢呼快乐的不只是我们自己，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被压迫者，都在那里庆祝欢呼！……”雨水顺着他的帽檐往下滴，打湿了军装，可每一个字都砸在战士们心上。

在热烈的口号声中，欢迎队伍让出一条人巷。队伍慢慢移动，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领导人有说有笑地从中间走过，向两河口小镇的方向走去。军乐声、歌声、口号声，在黄昏的暴雨里震荡着，飘向梦笔山，飘向虹桥山——这一天，两河口的雨没停，可战士们心里的火，却烧得比任何时候都旺。

天宝当红军

1935年春天，被禁锢得像铁桶一样的“四土”¹地区传来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消息。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和土司头人散发了大量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谣言，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不但土司头人、普通老百姓到山上躲避，连寺院僧众也吓得躲藏起来。

18岁的桑吉悦希出生在一个贫苦藏族农民家庭，父母早逝，他和两个弟弟受尽苦难。大弟长期流落异乡、乞讨为生，二弟被人拐卖到草地当了奴隶。他作为长子，按照当地习俗8岁时被送进党坝色德基寺庙当扎巴。寺庙里的日子单调而清苦，桑吉悦希每天除了学念经、学藏文，就是清扫庭院、背水、打柴。

红军进入“四土”地区不久，藏族同胞发现这支汉人队伍纪律严明、和蔼可亲，不进寺院、不住民房，虽然语言不通，却总是笑眯眯地打着手势与他们交流。渐渐有些胆大的人下了山，知道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专打国民党军队，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他们宣扬和实施的民族团结平等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深得藏族群众的拥护和欢迎。群众的疑虑和恐惧慢慢消除，他们亲切

¹ “四土”地区指封建王朝册封土司制度的嘉绒地区的梭磨宣慰司、卓克基长官司、松岗长官司和党坝长官司4个土司地区，位于今阿坝州马尔康市。

地称红军为“救苦救难的活菩萨”。那些躲避到山林中的群众也纷纷返回家园，重新过上安稳的生活。

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感召下，在相信红军是真正为穷人办事的、可以信得过的信念支持下，桑吉悦希毅然参加了红军，被任命为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副队长。他既通藏语，又有汉语文字基础知识，思想政治觉悟提高很快，同时工作积极，打仗勇敢，年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党和红军为了使藏族人民获得真正的解放，十分重视在藏族地区建立民族自治政权。1935年11月，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在绥靖成立，这是红军在藏族地区建立的最早的民族自治政权。12月，组建格勒得沙革命党，由藏族中“觉悟最先进、斗争最坚决、承认本党党章，能为本党党纲坚持奋斗，不顾一切牺牲的分子”所组成。桑吉悦希担任党坝革命军中央党部青年部部长、格勒得沙革命青年团中央团部长。不久，由于红四方面军南下受阻，回到川康地区，桑吉悦希被调任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

1936年秋，桑吉悦希所在的红军部队为了北上抗日需要，奉命集中大金、卓克基、党坝、卓斯甲、梭磨等地的格勒得沙革命军和少先队，组编成一支少数民族革命武装“番族人民自卫军”，桑吉悦希任党代表。他和金世柏等人率领这支部队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再次穿越雪山草地。这支队伍的行动根据任务的不同而灵活多变，时而走在前面为大部队开路，时而断后阻击追兵，时而护

送伤病员，时而收容掉队人员。同时，桑吉悦希遵照上级指示，还挑选出一批政治思想好、身强力壮、熟悉地形的藏族战士当翻译、做向导。到达甘肃省的岷州后，“番族人民自卫军”建制撤销，所有人员编入其他部队继续北上。

193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十分重视民族工作，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定边县创办中共中央党校，专门设立少数民族学员班，全班共有藏、彝、羌、回、蒙古等民族学员20名，桑吉悦希被任命为班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每周轮流到中央党校讲课。

一次，毛泽东同少数民族学员座谈时，学校领导介绍桑吉悦希是民族学员班班长，来自四川马尔康。

毛泽东称赞：“了不得，叫什么名字？”

“桑吉悦希”。

毛泽东又问：“桑吉悦希，在藏语中是什么意思？”

桑吉悦希解释说：“‘桑吉’是佛祖的意思，‘悦希’是宝贝的意思，是活佛取的名字。”

毛泽东听后笑道：“你们都是我们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是佛祖赐给我们红军的宝贝。长征时经过你们家乡，你们家乡物华天宝和‘悦希’差不多，我看你就叫‘天宝’吧。”大家鼓起掌来。从此，桑吉悦希就成了“天宝”，天宝当红军的故事也流传开来。

地里的钱币

1935年的夏天，马尔康的山谷里弥漫着淡淡的雾气。红军长征的队伍踏入了这片“四土”地区，迎接他们的却是一片寂静。村庄里空无一人，院落和碉房的门紧闭着，牛羊散落在山坡上，无人看管。原来，当地的百姓因受土司头人的恐吓和欺骗，早已躲进了深山。

红军战士们并没有因为眼前的荒凉而松懈。他们知道，越是艰难的时刻，越要严守纪律，维护军民关系。战士们自发地整理起空无一人的房间，打扫院落，甚至将散落的牛羊牵回圈里。尽管粮食极度匮乏，但他们始终牢记党的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绝不侵犯群众的利益。

一天，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来到连队检查纪律执行情况。他走进一间简陋的碉房，看到战士们正在整理房间，地上铺着干草，墙上挂着几件破旧的军装。何长工点了点头，转身对身边的战士说：“我们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无论多困难，都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

战士们齐声应道：“是！”

何长工走出碓房，看到几名战士正在地里挖萝卜和洋芋。他皱了皱眉，快步走过去问道：“这是谁家的地？主人找到了吗？”

一名战士抬起头，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回答道：“报告政委，我们找遍了附近的村子，没找到主人。战士们已经几天没吃饱了，实在没办法，才挖了一些萝卜和洋芋。”

何长工沉默了片刻，随即说道：“挖了群众的粮食，必须按价赔偿。你们在地里放钱了吗？”

战士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掏出几枚铜钱，小心翼翼地放进挖开的土坑里，又在旁边放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红军路过此地，因粮食短缺，挖了您的萝卜和洋芋，特此留下钱币作为补偿。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绝不白拿群众一针一线。”

何长工看了看纸条，满意地点了点头。他转身对战士们说：“记住，我们是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无论多困难，都要严守纪律，决不能辜负群众的信任。”

几天后，躲进深山的百姓们陆续回到了村庄。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的院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牛羊安然无恙地待在圈里。更让他们感动的是，地里挖开的萝卜坑和洋芋坑里，竟然放着几枚铜钱和一张纸条。

一位年迈的老人颤巍巍地捡起纸条，手里捧着铜钱，眼眶渐渐湿润了。他喃喃自语道：“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见过很多军队，

只有红军……才是老百姓的队伍啊。”

村里的百姓们纷纷传颂着红军的事迹，他们知道，这支队伍与众不同。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然严守纪律，维护群众的利益。而那些地里的钱币，也成了马尔康百姓心中永远的印记。

海拔 4450 米的信仰

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坂山、马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梦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磨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三十军执行张国焘南

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驻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以及妇女独立团一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崇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磨、马塘第四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儿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

第四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她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

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

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 12 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一三七团政委张梓和一四一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 12 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 1936 年 7 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梓政委立即决定收殮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木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 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 4450 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作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

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 4450 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毛泽东命战士归还腊羊架子

1935年8月初，川西北的风里已经裹着草地的寒凉，红一军团向着毛儿盖集结，行至波罗子这个藏汉杂居的小地方，暂时停下了脚步——这是部队进入茫茫草地前，为数不多能补充粮食的地方。这里矮屋错落，田埂边立着玉米、青菜，院角的南瓜坠着藤，鸡啼狗吠声在村落里飘着，好些人家门外还贴着汉文对联。在藏族聚居区走了许久，这样的烟火气让战士们都松了几分心。

沿途的喇嘛庙前，一张张红军总政治部的布告被仔细贴着，红纸上的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保护兄弟民族的宗教自由，一切人均不得侵扰寺院。这不是一句空话，是红军总司令部定下的铁律，从普通战士到党的高级领导人，人人都得守。

毛泽东也随部队驻扎在波罗子，连日行军加上粮食紧缺，他和战士们一样，日日靠着青稞、野菜果腹，警卫员们看在眼里，心里总想着能给首长改善一顿伙食。这天，几个警卫班的战士趁着空隙，偷偷走到附近一座喇嘛庙旁，庙里的僧人因受土司头人的恐吓和欺骗暂避在外，四下静悄悄的。在一间堆放杂物的屋子里，他们意外发现了一副腊羊架子，那油亮的腊味在缺衣少食的

日子里发出诱人的香味。几人又喜又急，悄悄把腊羊架子搬了回去，想着能给毛泽东炖一锅热汤，补补身子。

可战士们刚把腊羊架子放下，就被毛泽东发现了。看着那副腊羊架子，他的脸色沉了下来，目光望向警卫员王七九，语气严厉又坚定：“在什么地方拿的，还送到什么地方去！”警卫员们低着头，脸上满是委屈，却不敢多说一句。毛泽东看着眼前这些心疼自己的战士，语气渐渐缓和，却依旧字字坚定：“我说过多少遍了，要严守纪律。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本就不了解我们，敌人又在背后散布反动宣传，群众见了我们都躲起来了。要让他们信得过红军，就得用我们的行动说话，行动才是最好的宣传啊。”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个战士，轻声道：“你们的心情我懂，可你们想过没有？现在全军都在挨饿，战士们在前线扛着枪、走着路，谁不是啃着硬邦邦的青稞，挖着苦苦的野菜？我是首长，更不能搞特殊。”

一番话，让警卫员们红了眼眶，王七九立刻扛起腊羊架子，转身往喇嘛庙走去，小心翼翼地将东西放回了原处，又仔细收拾好屋子，才默默返回。当王七九站到毛泽东面前时，毛泽东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一字一句地说：“谢谢你。”这一声感谢，是谢他遵守了红军的纪律，更是谢他懂得了红军与百姓的心连心。

在长征的漫漫长路上，毛泽东始终把自己当作红军队伍里的

普通一员，严格执行着“党员干部不能搞特权”的纪律，不仅约束自己，更时刻要求身边人守规矩、严律己。这副没能炖成汤的腊羊架子，成了波罗子最深刻的一课，让所有人都记着：红军的纪律，是刻在心里的铁律，是扛在肩上的责任。

周恩来病重心系纪律

长征路上的日日夜夜，周恩来从不搞特殊，总与红军战士同吃野菜青稞。但日夜操劳让他身体早已透支，营养不良的身体再也撑不住，党中央沙窝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骤然病倒了。

这场病来得又猛又急，高烧连日不退，肝部肿得厉害，皮肤也渐渐发黄。经医生会诊，确诊是肝炎发展成了阿米巴肝脓疡，必须立刻排脓才能保命。可红军正行进在荒无人烟的川西北，行军途中缺医少药，连最基础的开刀条件都没有，医生只能一边用药，一边让战士从附近高山取来冰块，敷在他的肝部进行冷敷降温。病情迅速恶化，周恩来陷入了昏迷，这可急坏了众人。毛泽东一边指挥前线作战，一边抽出时间来看望照料，还叮嘱身边人悉心看护。不久后，组织又特地把邓颖超调来，守在周恩来的病榻旁悉心照顾。

冷敷的过程漫长又煎熬，医生守在一旁寸步不离，七个多小时过去，终于等到了转机——脓液顺利排出了半盆，周恩来连日的高烧慢慢退了下去，众人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

稍稍清醒的周恩来，顾不上自己虚弱的身体，心里记挂的仍

是红军北上的大事和部队的纪律。1935年8月11日，他强撑着病体，亲自拟写了一封400余字的电报，发给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前线指挥员，仔细交代北上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专门用两条内容强调纪律：“丙，严整纪律，争取番民回家；丁，努力筹粮，反对浪费，改善给养，每人带足15天粮食。”

这份从病榻上传出的指示，很快传遍了红军队伍，也深深印在了每一位战士的心里。红军战士童小鹏在日记里记录下当时的部队状态：“部队实行纪律突击，内容是：执行命令，遵守时间，动作迅速，整齐清洁，爱护武器，提倡礼节。部队生活很紧张。”肖锋的日记里，也同样出现了“纪律突击”的字样。

周恩来躺在病榻上，连起身都十分艰难，心里却始终装着整个红军队伍，装着行军作战的每一个细节，装着部队纪律的坚守。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这份对纪律的严格坚守，化作一股强大的力量，让红军战士们的纪律意识愈发坚定，也让这支队伍在艰难的长征路上，始终保持着铁一般的凝聚力。

拐棍碑

长征途中，拐棍是红军战士非常亲密的伙伴，爬雪山用它撑地防滑，过草地用它探路，都非常管用。

1935年8月，为了掩护和保障军委直属队顺利通过草地，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从四川松潘的毛儿盖出发，向“人陷不见头，马陷不见颈”的茫茫草地进军。

经过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后，空气就越来越潮湿，阵阵腐朽霉烂的气味扑鼻而来，呛得人简直喘不过气睁不开眼，部队进入了大草地。草原一望无际，没有树木，没有炊烟，到处是野草浸泡在黑黝黝的水坑、水洼里，人踏上去便发出“卜啣卜啣”的声响，稍不注意就会陷进去爬不出来，被沼泽吞噬。起初，红军战士不知道草地的脾性，不少人陷进去了。后来有了经验，一旦陷进去，马上倒地翻滚，这才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牺牲。

草地的气候变化无常，刚才还是烈日当头，转眼便是大雨倾盆。进入草地的第三天，傍晚雾气蒙蒙，大雨伴着冰雹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打得脸颊生痛。眨眼的工夫，草地一片水茫茫。这时天色已晚，红军战士行了一天军，又饿又累，部队便以班为单位

就地休息。在团里任参谋的萧思明找到一块比较高的地方，同团长杨得志背靠背席地而坐，用一块油布顶在头上，准备休息。这时，伴着炒豆般的雨点和冰雹砸油布的声响，一曲曲《红军歌》《上前线去》等歌声飘过来，那是红军战士们在雨中唱歌哩，两人也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

夜深了，杨得志突然问萧思明有没有吃的东西，刚好萧思明还有一包炒面在挎包里，便拿出来分着吃。吃过炒面，口干得不行，可水壶里一滴水也没有了，萧思明只好拿出缸子接从油布上流下来的雨水，俩人分着喝。有趣的是，俩人竟都喝出了甜味儿，这样便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境。

天刚拂晓，团参谋长胡发坚跑来报告团长，说发现有一个班的同志在草地上没有动静。俩人立即跑过去，只见一处稍高的草地上，红军战士整整齐齐地两人一组，背靠着背静静地坐在地上，怀里抱着枪支，像熟睡了的样子，已经全部牺牲了。

战士们挥泪埋葬了战友，将这些战友的军帽一个个安放在坟头。想到这些战友将永远默默地长眠于草地，想到他们从枪林弹雨中突围出来，牺牲在这荒无人烟的草地里，连一个名字也不能留下，大家心里都不是滋味。草地上找不到一块石头可以用作墓碑，杨得志让战士们将烈士的拐棍找来，在上面刻上烈士的名字，立在坟前，这才使每一位烈士都有了一个墓碑。

一根细细的拐棍，在茫茫草地中保存不了多久，但却如一座丰碑，深深留在活下来的红军战士的心里，激励着他们继续前行。

最后一口粮

1935年秋，川西北的草地像一片无边无际的黄色海洋。寒风卷着湿气，钻进红军战士们单薄的军装里。在这片被称为“死亡陷阱”的沼泽地上，红四方面军一支队伍正艰难地挪动着——他们已经半个月没见到一颗粮食了。吃树皮、草根也由三餐减到两餐。

重重困难考验着艰苦行军的红军将士，恶劣的气候条件，饥饿的煎熬，行军作战的劳累，使得病号一天天地增加，很多战友只要一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连队的司务长姓丁，安徽人，是从鄂豫皖苏区转战到川陕苏区的，能识几个字，会打算盘，连队同志们都亲切地唤他“老丁”。他对革命事业负责，“管家”当得好，所以在川陕苏区时，连队的伙食就搞得比较好，除了保证同志们吃饱吃好以外，每人每月还能分到几分钱的伙食尾子。

行军路上，老丁的油盐担子从不离肩，还经常帮伤员背枪，帮炊事班扛锅。进入草地后，老丁的口粮袋总是瘪得最快——他把自己的青稞面掰成几份，悄悄塞给扛机枪的战士和体弱的病号。

“你们吃饱了好打冲锋，消灭敌人。”老丁总是这么说，好像自己从来不饿。

有一天晚上，前锋部队发来电报说，前边 200 里的地方有村庄了，大约再有三天就可以走出草地。大家非常高兴，第二天天不亮就出发了。

走到太阳偏西时，炊事班长刘玉生突然发现老丁落在后面。他赶紧折回去，看见老丁正拄着扁担喘气，脸色白得像纸。“司务长！”刘玉生冲过去扶住他。老丁摆摆手，想说什么却提不起力气。刘玉生慌忙解下自己的干粮袋——那是一个用粗布缝成的口袋，已经瘪得只剩一层布了。他使劲抖了又抖，终于在角落抖出小半把青稞面，捧在手心里像捧着金子。“您快吃两口！”老丁看着那点青稞面，喉结动了动，却坚定地摇头：“你背行军锅比我辛苦，留着关键时候吃。”“您不吃我不走！”刘玉生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老丁突然站直身体，声音变得严厉：“刘玉生同志！我命令你，把青稞面装回去！”这是进入草地以来，老丁第一次用命令的口气说话。刘玉生愣住了，手僵在半空。老丁的语气又软下来，他拍了拍小刘的肩膀：“我拔几棵野菜，边走边吃就能跟上。快走，别掉队。”老丁竭力坚持着和部队一块走，到了宿营地后，他笑嘻嘻地对炊事班的同志说：“明天再加上一把劲，胜利就在眼前！”

大家走出草地心切，天不亮又赶紧集合出发。走到中午，队

伍爬上一个小山头，司务长再也走不动了。他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可是坐下去就起不来了。他闭着眼睛，脸发白，嘴发乌，呼吸越来越困难。刘玉生心里又着急又难过，再一次提起干粮口袋说：“司务长，您吃上两口垫垫饥，咱们一起走吧！”司务长用尽全身力气只发出很低的声音：“小刘班长，我不能吃，你留下吧，我吃了你的青稞面咱俩都得饿死，多活出来一个人，是革命的一份力量。你千万不能把我们连里的两口大锅丢掉了。走出草地有了村庄，你满满地做上两大锅饭，让同志们吃得饱饱的，好去消灭敌人。”说完，他慢慢地从身上解下钱袋对刘玉生说：“这是全连的伙食费，账本也在里面。离开苏区以来，结账还剩下大头洋、川洋、藏洋一共 56 元。连长、指导员曾说走出草地打胜仗后，要给同志们会餐，这个任务只有你去执行了。”他吃力地喘息了半晌才又接着说：“你告诉指导员走出草地上级发零用钱时，替我交这个月的党费。”他的目光最后落在油盐担子上：“这副担子……你担上……”话没说完，老丁的眼睛慢慢闭上了。而那只一直紧紧攥着账本的手，也终于松开了。

油盐担子上深深的压痕，像年轮一样刻进了红军战士们今后的岁月里，他们永远记得那个宁愿自己饿死也不舍得吃干粮的司务长。在生死边缘，有人选择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亡留给自己，因为他们心里装着比生命更重的东西。

红军神兵战川军

1935年11月初，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三十军和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九军二十五师等部在连克宝兴、天全、芦山等地守敌后，兵分三路进入成都邛崃西南山区。

是夜，红军从芦山大川飞仙阁疾驰而出，追击着向邛崃境内溃退的国民党军队。当追至邛崃境内的冒石子至安家坡一带时，已近晚上10点，夜色浓稠如墨。“砰砰砰”，激烈的枪声打破了夜的宁静，红军与敌军守安家坡的一个营接上了火。敌军在黑暗中摸不清红军的虚实，不清楚红军究竟来了多少人马，一与红军交火便惊慌失措，匆忙拔营，向着冷浸沟口的瓦厂岗逃窜。

瓦厂岗是一个高山隘口，冷峻而威严地矗立在芦山大川入邛崃的必经之路上。一条仅两公里深的冷浸沟横亘其前，两侧高岩陡峭，沟道狭窄，构成了天然的防御屏障。敌军妄图凭借这里的险要地势阻挡红军的追击。然而，他们却低估了红军战士的勇气与智慧。

追击敌军的只有八名红军战士，且有三人在冒石子、白石河、老熊洞的激战中受了伤。幸运的是，红军的向导是熟悉这里地形

的当地群众。在向导的协助下，5名红军战士迅速制定了作战计划，兵分三路展开了一场巧妙的奇袭。

中路，三名红军战士主动请缨，担任正面佯攻的重任。他们弯着腰，在夜色的掩护下，快速向要道靠近。敌人的子弹如雨点般扫射过来，在他们身边激起尘土。但他们毫不畏惧，一边灵活地躲避着子弹，一边大声呼喊，制造出大部队即将进攻的假象，吸引敌人的火力全部集中到正面要道。敌人果然中计，疯狂地向着正面射击，密集的枪声划破夜空，火光在黑暗中闪烁。

与此同时，另外两名红军战士在向导的带领下，踏上了极为艰难的攀爬之路。两侧的岩壁长满了树木、杂竹与蔓藤，陡峭而湿滑，稍有不慎便会粉身碎骨。但他们没有丝毫犹豫，手脚并用，一步步艰难地向上攀爬。粗糙的岩石划破了他们的手掌，鲜血顺着手指滴落，两名战士在黑暗中悄无声息地爬上岩脊，而敌军还在疯狂地向中路射击，对红军的到来毫无察觉。到达预定位置后，两名红军战士迅速拧开手榴弹，向着封锁深沟要道的敌群投去。“轰轰轰”几声巨响，手榴弹在敌群中炸开了花，火光冲天，硝烟弥漫。敌人被炸得乱了阵脚，抱头鼠窜，惨叫声此起彼伏。

正面佯攻的三名红军战士瞅准时机，对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他们端起枪，向着慌乱逃窜的敌军扫射，呐喊声震彻山谷。深沟内的敌军本就被手榴弹炸得惊慌失措，此时面对红军的凌厉攻势，彻底失去了抵抗的勇气，惊惶地向后夺路溃逃。

驻守木梯埡隘口的敌军，听到溃退过来的敌军呼喊“红军打过来了！”顿时军心大乱，他们来不及多想，也不敢再作抵抗，亦随之连夜向着油榨、火井方向仓皇逃窜。一时间，山谷中满是敌军慌乱的脚步声和喊叫声。这 8 名红军战士，就像从天而降的神兵，以少胜多，打破了敌军的防御，攻克了安家坡、瓦厂岗、木梯埡等据点。

至今，邛崃南宝一带还流传着“红军派出八神兵，打垮川军一个营”的故事。

最后的党费

1935年11月的川西，寒意如刀，浸骨穿髓。天全城西郊的沙坪河裹挟着碎冰碴子咆哮流淌，对岸的大岗山隐在灰蒙蒙的雾气里，透着肃杀之气。8日清晨，一声枪响划破寂静，南下红军右纵队先头部队与川军郭勋祺部狭路相逢，红四军第十二师战士们顶着密集机枪火力，一次次向河东岸冲锋，鲜血在冰冷的河水中晕开了悲壮的红花。

川军的工事密密麻麻，战壕蜿蜒蔓延，机枪碉堡如毒瘤般扎在大岗山腰，子弹贴着河面呼啸而过，每一朵溅起的水花背后都可能是一条年轻的生命。红军多次冲锋，都被压了回来，形势极为不利。红四军军长许世友心急如焚，决定红十二师暂停攻击，派出交通队侧面迂回进行夜袭。命令传下去，红十二师第三十六团第三营政委邹树正很快来到许世友面前。他个子不算高大，却透着战场淬炼的铮铮硬气，一口湖北麻城口音干脆坚定地向许世友立下军令状：“我带交通队去夜袭端掉这些碉堡，坚决完成任务！”身后的交通队队员腰别短枪、背插大刀，眼神亮得像要燃起来，满是必胜信念与对政委的绝对信任。

为避开敌人视线，交通队换上缴获的川军灰布军装。当地群众姜希福和周绍轩也主动赶来当向导。姜希福攥着一支火把，语气笃定地告诉邹树正：“政委，坛罐窑那边水浅能蹚过去，保证不耽误事儿！”

傍晚，雾气愈发浓重，如巨大幕布笼罩天地。邹树正走在队伍最前列，不时回头叮嘱：“跟上，脚底下留神，别踩出声响！”夜色渐深，沙坪河的水声呜咽，潜伏的红军战士目光如炬，呼吸轻得生怕惊扰突袭。许久后，大岗山南麓亮起两个火点，晃了三下——这是邹树正发出的总攻信号，如暗夜星辰点燃希望。

总攻号角响彻夜空！红军战士“哗啦”蹚进沙坪河，冰冷河水漫过膝盖，刺骨寒意让人牙关打颤。邹树正带领交通队如尖刀般插入敌人腹地，歼灭半山腰两个连后，调转枪口夹击河东岸守军，敌人腹背受敌，阵脚大乱。

“冲啊！把敌人赶下去！”邹树正沙哑的呐喊满是力量。他身先士卒，刚挡开一名川军的刺刀，一颗子弹便擦过他的脖子，鲜血染红衣襟。他抬手抹掉血迹，嘶吼着继续冲锋，却被一梭子弹正中腹部。

身旁战士惊呼扑来，邹树正捂住肚子，鲜血从指缝喷涌。寒风裹挟着钻心剧痛，让他浑身发抖，冷汗湿透头发，可眼神依旧锐利如锋。“别管我！快跟主力会合，把敌人赶下去！”他咬紧牙

关，用衣角裹住伤口，缓缓坐下艰难端枪，凭着最后气力精准射击，直至手臂沉重、视线模糊。

天快亮时，战斗结束，川军一个团被歼灭大半，对岸工事尽数拿下。战士们顾不上清理战场，疯了似地在山坡上搜寻邹树正，终于在一处阵地找到昏迷的他。邹树正脸色惨白，嘴唇干裂带血，却仍紧攥着陪伴自己征战多年的枪。

许久，邹树正缓缓睁眼，疲惫的眸子扫过战友，最终望向远处飘扬的红旗，嘴角露出欣慰笑容。他颤抖着摸向胸前血浸的衣兜，掏出一枚带着还带着体温的银元，声音微弱却字字千钧：“我……疼得厉害，不行了……这枚银元，是我最后一次……交的党费……”话音刚落，他的手轻轻垂落，永远闭上了双眼。战士们摘下军帽，肃立在他们敬爱的政委身边，泪水无声滑落。风依旧吹，沙坪河依旧流淌，仿佛在为英雄哀悼。

这枚珍贵的银元被战士们小心珍藏，跟随红军走过雪山草地，历经无数战火洗礼，见证无数生死离别。它代表着为信仰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矢志不渝的初心与使命。

横山岗战斗

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三十军进入成都大邑县横山岗。横山岗地处大邑、邛崃、芦山三县交界处的高山隘口，以其险峻的地形构筑起成都平原最后的天然屏障——向东南50公里便是大邑县城，再往前便是一马平川直抵成都。红军要打通芦山、宝兴等县至成都的交通线，横山岗是必争之地。

在获悉红军将要南下的消息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别动队派中队长蒋玉麟赶赴大邑监修碉堡，以县城为中心构筑起由217个碉堡组成的立体防御体系。刘湘部队更在双河、横山岗一线深挖战壕、广设工事，将这片海拔2000多米的山地打造成铜墙铁壁。凛冽的寒风肆虐山巅，国共双方在这片云雾缭绕的群山中，即将展开一场生死较量。

11月10日，红九军二十七师七十九团和红三十军一部在前敌总指挥徐向前的带领下，从雅安芦山大川出发，分三路向驻守在成都大邑横山岗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红军左翼经花架子迂回包抄，右翼取道唐王坝椒子坪，中路则沿小河子正大路直扑隘口。

是夜，中路红军在回龙庙完成集结后，派出一个排借着夜色

向尖山子摸进。排长突然发现前方两点火星时闪时灭，那是敌军哨兵在抽烟取暖。随着手势落下，战士们如猎豹般扑出，两名敌军哨兵还未及反应便已毙命。但在解决第三处岗哨时，一声走火的枪响撕裂了寂静，随即爆发的交火中，排长与两名战士用生命换来了敌军防线的缺口。红军当即调整战术，转而从防守薄弱的背面发起强攻，集中火力一举摧毁三座碉堡，生擒敌军营长陶宗伯。

国民党军早在尖山子两侧半坡的“锅底函”山岗上设了一道工事，又在山顶两侧修筑了战壕和碉堡，构筑起交叉火力网。当红军手持马刀、长矛和简单枪械攻破第1道工事到达“锅底函”时，遭到国民党守军用步枪、手枪和重机枪的猛烈扫射。红军战士们手持简陋的武器发起波浪式冲锋，前面的身影在弹雨中倒下，后面的立即补上位置。爆破组前赴后继地向碉堡突进，不断有战士抱着炸药包倒在血泊中，但总会有新的身影拾起染血的炸药包继续前进。山谷中回荡的不仅是枪炮轰鸣，更有此起彼伏的冲锋号声与呐喊声。经几次冲锋，红军终于冲破了敌军工事，炸开了碉堡，用血肉之躯撕开了第二道防线。

右翼红军在花架子遭遇地方民团顽强阻击。经过数小时拉锯战，红军以凌厉的攻势突破刘湘部在横山岗构筑的碉堡群，击毙大邑地方民团指挥任年丰。在密集的枪声中，国民党军乱了阵脚，全面崩溃，落荒而逃。攻击横山岗左翼和右翼的红军会合后，配

合追击退出横山岗的溃散之敌。追到邻近双河场口龚家坪对河时，与敌方援军驻守双河场的杨晒轩旅相遇发生枪战。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红军撤退到横山岗的邱河坝与中路红军会合。这是红军南下距离成都最近的一次。

12月8日，国民党第二十一军、第二十八军趁大雪封山之机联合向红军驻地发起进攻。红军被迫从邱河坝撤回横山岗、花架子、唐王坝一带，但仍击落敌机一架。1936年2月，刘湘集中二十一军、二十八军三个团的兵力，并纠集邛江地区的千余名反动民团及地方伪土匪武装突袭驻扎在横山岗不足一个团兵力的红军。缺粮少弹的红军将士在冰天雪地中血战两昼夜，最终因寡不敌众且无后方补给，不得不突围北上。但红军将士留在横山岗的每一处战壕、每一块弹痕，都见证着用生命书写的忠诚与勇气。

红军班长赠宝刀

1935年寒冬，红四方面军进入了大邑横山岗。红军宣传队在农户的墙壁，路旁的石壁、石坎上刷写和篆刻宣传标语，张贴油印传单，向人民群众传播革命真理。红军战士四处张贴用四开白纸木刻印刷的《约法十章》：一、不乱杀人；二、保护穷人；三、帮助回番；四、民族平等；五、取消款子；六、买卖公平；七、发粮分田；八、信仰自由；九、增加工钱；十、优待士兵。在宣传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红军建立以横山岗为中心的村苏维埃，帮助当地组建人民武装组织和少年先锋队、妇女委员会等群众组织，带领群众惩办地主豪绅，组织抗捐、抗丁、分粮等活动，与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村民李忠诚在红军政策的感召下成为部队的向导，并积极邀请一个班的红军战士住在他的家里。红军班长姓张，随身携带着一把锃亮的马刀，刀柄上有深深的握痕，刀身则泛着冷冽的寒光。随着与张班长逐渐熟络，李忠诚也知道了这把刀有着不平凡的来历。原来在剑门关战役中，张班长曾持此刀连斩8名顽敌，为红军打开了入关通道。这是一把锋不可挡的宝刀啊！

不久，国民党派重兵占领了红军前沿阵地尖子山。住在李忠诚家的红军班被任命为尖刀班，奉命夜袭夺回阵地。

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李忠诚带领红军班战士踏着积雪，沿着一条人迹罕至的小径向山顶进发。当队伍抵达阵地时，战壕里竟空无一人——原来敌军耐不住严寒，躲进了附近的岩洞取暖。洞中，百余敌军正抱着枪酣睡。

“缴枪不杀！”红军战士的怒吼惊醒了睡梦中的敌人，敌人连忙跪地求饶。就在张班长准备派人去团部报告情况时，一个外出解手的敌兵发现了情况，连滚带爬地嚎叫起来：“霉老二摸上来了！”这声喊叫惊动了二线阵地的敌军，一个旅的兵力开始疯狂反扑。

激战中，李忠诚紧随张班长奋勇杀敌。当十几个敌军扑来时，张班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马刀递给了这位农民向导。李忠诚握紧这把饱经战火的马刀，竟接连砍倒5名敌军，余敌见状仓皇逃窜。不久，红军主力攻上山头，一举歼灭敌军大部，成功夺回尖子山阵地。

战斗结束，李忠诚把马刀还给张班长。张班长笑着说：“你用它杀死那么多敌人，帮了我们大忙，这把马刀就送给你吧！”

红军北上后，白色恐怖笼罩横山岗。国民党军四处搜捕红军遗留物品，扬言“对隐匿的，就地处决”。李忠诚将马刀用油布层

层包裹，藏入陶罐，深埋于自家墙根之下，直到解放后才把它挖出来。1987年，李忠诚的儿子将马刀捐赠给了大邑县文管所。如今，这把砍杀过敌人、埋过黄土、见证过军民真挚情谊的马刀静静地放在大邑县文管所的展柜里，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战斗故事，一段段红军与人民血脉相连的永恒情谊。

传家扁担

在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内，陈列着一根看似普通的木扁担。它的背后，是一段长征途中红军战士与邛崃百姓感人至深的军民情谊。

1935年，红军长征来到邛崃，在高何等11个乡镇建立了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权，组织发动群众斗地主、分田地，备受当地群众的拥护。

驻扎在高何镇的红军部队中，许多战士因战斗负伤，还有好多人患上了疟疾和疥疮。疟疾发作时，战士们忽冷忽热，高烧不退；疥疮更是让他们皮肤溃烂，瘙痒难忍。当时缺医少药，条件艰苦，大家只能强忍病痛。

家住邛崃高兴村7组的张崇荣是个老中医，祖传医术在当地很有名气。当他得知红军战士的困境后，心急如焚。张崇荣下定决心，要为红军治病，便动员全家一起跟他上山采药。

采药之路，艰难险阻。常常天还未亮，张崇荣一家便背着竹篓、手持镰刀，向着深山进发。山间雾气弥漫，道路湿滑，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稍不注意就可能滑倒跌入山谷。且山中常有野

兽出没，时不时传来几声吼叫，令人毛骨悚然。有一次，一条粗壮的蟒蛇横在前方，吐着信子，张崇荣的儿子吓得脸色惨白，几乎瘫倒在地。但张崇荣深吸一口气，镇定地挥舞着镰刀，慢慢后退，带着家人绕开了危险。一路上，他们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在逶迤的山脉峡谷中仔细搜寻着救治红军的草药。每发现一株草药，大家都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采下，放入竹篓。

回到家后，张崇荣顾不上休息，立刻支起大锅，生火熬药。熬好药后，他又和家人将汤药盛好，急匆匆地送往红军营帐。到了营帐，他耐心地给染疾的战士们分发汤药，并嘱咐战士们按时服用，还细心地询问每个人的病情，根据症状调整药方。

日复一日，张崇荣带着一家在大山、家和红军营帐之间不知疲倦地穿梭。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战士们的病情逐渐好转，苍白的脸上重新泛起了血色，曾经被病痛扭曲的面容也渐渐舒展开来。他们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重新投入到紧张的革命工作中。

1936年2月，春寒料峭，红军接到战略转移北上的命令。离别之际，红军战士们对高何这片土地和这里的百姓满是不舍，尤其是对张崇荣一家的救命之恩铭记于心。红军战士将一根随身所用扁担送到他手中，说道：“张医生，您的恩情我们无以为报。这根扁担是我们随身之物，留下做个纪念。”张崇荣接过扁担，泪水在眼眶中打转，依依不舍送别了红军。

从这以后，张崇荣将红军扁担视为传家宝，精心保存。后来，他把扁担传给了儿子张德成，张德成又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张永志。2005年5月，张永志将这根扁担捐赠给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他说：“这根扁担放在我家，只是我们一家人的宝贝；捐给纪念馆，就能让更多人了解红军的历史，传承这份红色精神。”

雪山忠魂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战士刘志海所在的前卫营接到立即翻越党岭雪山的命令。党岭雪山，主峰海拔5470米，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风暴雪崩不断。在附近老百姓心目中，它就像一道噬人生命的鬼门关。而此时许多前卫营战士包括刘志海在内，刚从阿坝翻越夹金山来到丹巴，都受凉感冒了，还没来得及养病休整。

军令如山，使命必达，部队立即整装出发。行进到半山，风雪与寒雾交织，天色渐暗，战士们纷纷点燃火把，一条“火龙”沿山脊蜿蜒而上。越往上走，空气越发稀薄，部队行进的速度越来越慢，大部分战士就连呼吸都变得十分困难，喘息声、摔跤声、咳嗽声此起彼伏。快到山顶时，忽然狂风裹挟着碎石，暴风雪如同猛兽般迎面扑来。火把熄了，刺骨的寒风吹得大家眼睛也睁不开，有的同志被暴风雪卷进山涧，有的滑倒在雪坑……

刘志海的太阳穴突突地跳动起来，他下意识地舔了舔皴裂的唇，干涸的唇纹已经渗出血珠，脚步也像灌了铅一般沉重。这时，只听到旁边一个微弱的声音说：“同志们，咱们慢慢走，可不能

停呀！”刘志海也咬紧牙关，默念着：“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随着高原缺氧症状不断加重，刘志海的意识逐渐被抽离，他感觉呼吸困难、心跳加速，双腿也不听使唤，忽地就栽倒在了雪地里。在这生命垂危之际，刘志海拼尽最后一点力量，将一张党证和一块银圆攥在手中，高高举起。

当主力部队第二天抵达前卫营宿营的崖底时，苍茫雪野中凝固着生命最后姿态的战友遗骸如同重锤击打着在场每一位战士的心。突然，一位首长看见雪地里显露出半截手臂，蜷曲的指节如同铁铸般扣成拳状。大家疾步上前，合力掰开冻僵的手指，赫然发现掌心紧攥着一张党证和一块银圆。党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一九三三年三月入党。”首长双手颤巍着缓缓接过党证和银圆，滚烫的泪水在眼里打转。他仰望天空深深吸了一口气，哽咽道：“志海同志，你的党证和最后一次党费，一定替你转交给党。安息吧，同志！”首长的誓言散入松涛，融进呼啸的山风，化作永恒的守望。

刘志海同志的遗体留在了高原雪地，但是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对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的生动诠释，却永远激励着后来人。

骑兵师筹粮

红四方面军长征时，在炉霍成立骑兵师，第四军军长许世友能骑善战，被任命为骑兵司令员。接到任命，许世友十分高兴。骑兵部队刚组建，他就携枪佩刀骑马，接受了朱德、徐向前、刘伯承的检阅。

离开炉霍北上时，朱德叮嘱许世友：“专打敌人骑兵，侦察好道路，多为部队筹粮。”许世友在马上敬礼：“请老总放心，保证完成任务！”随后他骑马绕场一周，一声“出发”，3500多骑兵的马蹄声如激流般，踏上北上征程。路上，许世友骑在马上琢磨筹粮的事。他深知北上艰险，前两次过草地的经历让他明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暗下决心不管多困难，都要筹够粮食，保证主力过草地。

急促的马蹄声打断思绪，侦察兵报告前方已到色曲河。许世友率部穿过山沟，眼前景象让大家惊喜：蒙古包散落在河岸，绿油油的草地像地毯，成群的牛羊在吃草。“找到大粮仓了！”战士们欢呼着策马向前。马蹄声惊了牛羊，牧民们走出蒙古包，眼神里满是惊奇与恐惧，有的躲进蒙古包，有的赶牛羊往山沟跑，还有的举起了猎枪。许世友知道群众可能误会了，立刻命令部队停

下，让通司喊话：“我们是北上抗日的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抢东西，尊重你们的风俗！”这里离甘孜县不远，群众早听过红军，听通司解释后，气氛很快缓和。听说红军要筹粮过草地，牧民们纷纷献出牛羊、青稞、酥油。许世友让部队按价购买，群众不愿收钱，红军反复说明：“公买公卖是纪律，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第一天就筹到**400**多头牛、**1000**多只羊和部分粮食，战士们高兴得赶着牛羊返回集合点。

深夜，战士们睡下后，许世友还和指挥员研究次日方案。大家发现筹到的粮食远远不够，普通牧民能捐的有限，土司头人却不愿多卖。许世友决定第二天再找土司交涉，可刚躺下，外面就响起枪声——反动土司派人袭击了。许世友立刻指挥反击。这些土司武装虽能骑善射，却不懂战术，红军一次冲锋就打垮了他们。从俘虏口中得知牛羊转移地点后，红军按“破坏抗日红军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财产一律没收”的政策收缴了反动土司的**8000**多头牛羊。之后，许世友率骑兵师继续北上，在西倾寺、壤塘等地又筹到**3000**多头牛羊和四五万斤粮食，**1936**年**7**月**13**日抵达阿坝附近。

许世友后来回忆到：“这次过草地路程远、时间长，但大家盼着回到党中央身边、上抗日前线，士气很高，顺利走出了草地。我们这支新组建的骑兵师，经**72**次战斗后只剩**200**多人，却筹到两三万头牛羊和大批粮食，完成了筹粮、侦察道路的任务。”

扎纳亚山口的最后嘱托

1936年4月底，在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率领下，红二军团抵达云南省中甸县略作休整，5月5日离开中甸，朝西康得荣方向进发。由于受反动宣传的煽动，一些藏族土司头人指挥地方反动武装，企图阻止红军前进。得荣阿村群则等人蛊惑当地18岁至60岁的男人共300多人，在上桥头村的扎纳亚山口构筑工事，妄图据险伏击红军。

5月6日，当地人廖扎安等对反动宣传有怀疑，力劝阿村群则等人未果，于是找一木牌写上：“红军长官，上桥头村以内只有18户穷佃户，都跑到山头上去了，在上桥头村对面的扎纳亚山头上有土匪伏击你们，切望警惕。”并连夜将木牌插于红军队伍必经的路边。

红二军团四师参谋长汤福林带领先头部队星夜兼程到达上桥头村，发现了插在路边的木牌。汤福林在木牌前细细读了两遍，感到不像是设的圈套，便立即动员部队做好战斗准备，调整战斗队形向扎纳亚山方向前进。当红军队伍走到离山岗还有10多米的地方，果然发现在垭口左侧山梁上有人头蠕动，汤福林马上命

令部队停止前进，做好战斗准备。“叭、叭”，土匪头目扎格香尊的枪响了，接着山梁上枪声大作，子弹像雨点般倾泻下来。两名战士不幸中弹牺牲。随即大石头漫山遍野地往下滚，土匪的狂叫声、石头碰撞声和枪声响成一片。面对险情，汤福林沉着冷静，果断指挥部队分兵迂回并迅速占领制高点，红军居高临下向盘踞在山梁上的土匪猛烈开火。与此同时，迂回到南面马鞍形垭口的红军也向土匪阵地发起了冲锋。土匪沿着山梁上的狭窄路段败退下去。

这时，有 10 多个土匪顺着山梁边打边退，企图抢占有利地形给红军造成威胁。汤福林又迅速带领部分红军紧追上去，快追到大红土坡时，一颗子弹飞来，一名红军连长中弹牺牲。汤福林怒不可遏，带领战士一鼓作气拿下了大红土坡高地，又身先士卒，率领一路红军顺岩槽悄悄向山梁爬过去，策应顺山梁追击顽匪的红军。阿村群则等顽匪发现了岩槽处的红军，便开枪射击，三名红军战士中弹牺牲。汤福林听见枪声，刚想转身查看，一发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战士们赶快进行救护，汤福林躺在战士的怀里，深情地望着大家，忍着剧痛，用十分微弱的声音说道：“同志们继续北上……”话还没说完，就停止了呼吸。红军战士们个个义愤填膺，化悲痛为力量。他们勇猛地 toward 顽匪发起攻击，盘踞在扎纳亚山口的土匪终于被击溃。红军队伍迎着朝阳，胜利翻过垭口，马不停蹄继续向北进军。

特殊的斗争

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城郊举行了会师大会。会师大会后，部队积极准备北上。但是，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却暗藏私心——他虽被迫取消了“第二中央”，但仗着红四方面军兵多枪多，个人野心愈发膨胀，一场分裂党和红军的危机正悄然酝酿。

会师的暖意尚未消散，朱德、刘伯承等人就开始积极做红二、六军团领导同志的工作，向他们揭露张国焘搞分裂活动的真相。朱德在会见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政治委员任弼时、总指挥贺龙等同志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陕北，在毛泽东同志那里。”“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是大错误，这个人有野心；但是，今后还要对他注意争取、团结，促使他一起北上”。刘伯承叮嘱说：“对张国焘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

张国焘的动作来得很快。红六军团刚扎下营地，他派来的“工作组”就送来一批《干部必读》等学习材料。军团政治委员王震翻开一看，怒火直冲天灵盖——材料里竟公然污蔑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北上“是‘逃跑’，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还

指名道姓诽谤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王震当即下令将所有反动材料集中烧毁，并火速向任弼时报告。随后，任弼时、贺龙果断下令：“四方面军来的同志，只准讲团结、传草地经验，不准说中央半个不字；送来的任何材料，一律封存，不准下发！”贺龙更是斩钉截铁：“干部必读不准发，看了要处罚人，放在政治部！”

一计不成，张国焘又生一计。他深知贺龙、任弼时立场坚定，便转而拉拢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一次会面中，张国焘特意带来4匹膘肥体壮的好马，满脸堆笑地夸赞王震“勇猛善战、是红军的栋梁”。可王震一眼看穿了他的伎俩，挺直腰杆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这个部队是井冈山的，是毛主席领导成长的，不能反毛！”坚定的表态让张国焘碰了一鼻子灰。不久，他又借口“加强统一领导”，想调任弼时到总部工作，趁机给红二、六军团另派政委，妄图分化、掌控红二、六军团，却被任弼时、贺龙等人严词拒绝。

软的不行，张国焘又想玩组织手段。他派人对任弼时说：“两个方面军首先应该一致。”任弼时当即回击：“唯有在十二月决议（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见拉拢不成，张国焘又提议召开党的会议，想以“多数”压“少数”。任弼时敏锐察觉其阴谋，直接反问：“报告哪个做？有争论结论怎么做？”把会议拦下。随后张国焘又企图召开红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想用人

数优势逼红二方面军就范。任弼时、贺龙和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关向应连夜商议对策，最终提出“不能以多数压少数”的原则，再次挫败了他的图谋。任弼时后来回忆：“我就说，如果二、四方面军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国焘才吓倒，再不召集这会议了。”

1936年7月5日，中革军委的电令传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划归的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这一决定如同给红二方面军装上了“护身符”，彻底粉碎了张国焘分化、并吞的企图。在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等人的坚持斗争下，在两支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渴望团结北上的强烈意愿推动下，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分裂图谋。

不久后，红二、四方面军并肩踏上北上征程。高原的寒风中，两面红军旗帜始终紧紧相依。这场特殊的斗争，用铁的政治纪律守护了红军的团结，为三大主力会师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在党史上写下了一曲维护团结、坚守原则的英雄壮歌。

半截皮带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根据党中央指示，分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北上。

7月初，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四团八连战士周广才随中纵队从炉霍出发，经壤塘、查理寺，于26日进入草地。对于年仅14岁的周广才来说，这已是第3次过草地了，所在部队经历了更严峻的困难。

这次过草地虽然准备时间较长，每个战士都带了干粮，但路途更远、时间更长。周广才所在班原来有14名战士，到达草地时只有7个人了。草地走了不到一半就断粮了，战士们只好挖野菜吃，常常为了挖些灰灰菜、野韭菜，跑出很远很远的路。一路上野菜也不容易挖到，到最后连野菜的影子都见不着啦。没了野菜，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没办法，大家只好吃草根、啃树皮。草根又苦又涩，可还是得往嘴里塞；树皮粗糙得扎手，可为了不饿肚子，也只能硬着头皮啃下去。后来，大家发现枪带和皮鞋上的皮子也可以吃，就试着把皮子先用火烤一烤，洗净后放入水中煮，然后再切成一小条一小条的炖烂，这样吃起来味道不错。

可这些东西也没坚持多久就被吃光了，于是大家解下自己的

皮带煮着吃。凭着几条皮带，又坚持了一段时间。

吃到后来，全班最后只剩下周广才皮带了。这条皮带是 1934 年红军在任合场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一条棕褐色牛皮带，是周广才最引以为傲的东西，已经陪伴他两年了。可为了抵抗饥饿，挽救全班战友的生命，他将皮带贡献出来。

看着心爱的皮带被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皮带丝，漂在没有一点米的汤水里，周广才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当皮带第 1 个眼儿那一截被吃完后，他忍不住攥紧剩下的皮带，向大家提议到：“同志们，咱们不吃了。我们把半截皮带保留下来吧，走出草地，带着它去找党中央、去见毛主席。”就这样，同志们怀着对革命胜利的憧憬，忍着饥饿把这吃剩的半截皮带留了下来。

在随后的长征途中，班里 6 位战友相继牺牲。周广才将吃剩的半截皮带保存在挎包里，随红四方面军胜利到达延安。

为了缅怀战友，铭记那段艰难的岁月，周广才用铁筷子在皮带背面烫了“长征记”3 个字，并用红绸子包裹起来，压在了箱底。1975 年，周广才将珍藏了几十年的半截皮带捐献给了国家。

如今，这半截皮带静静存放在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大型主题展的“红军长征”展柜中。参观者每每见到这个红军战士们忍着饥饿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物，都会驻足很久，被红军长征的艰难生活所震撼，更被红军将士们的坚定信念和英勇无畏所感动。

牧民抚养红军娃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北上。中纵队由阿坝壤塘翻山到阿坝安坝，复经夺沟、沙湾等地时，藏族群众因受土官头人的欺蒙宣传，几乎都进了山林躲避。红军走后，阿坝县柯河区垮沙乡沙湾村村民索朗、仲加和桑加在返途中遇到一名身负重伤、气息奄奄的女红军，身边还带着一个大约6、7岁的小男孩。当她看见索朗他们时，竭力用颤抖的声音说着什么，手上还不停比划着。索朗等人虽不懂汉语，不过从女红军的表情仍猜出她的大意是：“我的病很重，求求你们救下我的孩子。”当索朗他们会意地把小孩抱到手里并向她频频点头时，这位女红军才终于放下心来，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们迅速就地掩埋好这名女红军，把孩子带到夺沟村民共特家里隐藏起来。

过了几天，村里不少人听说共特家有个红军娃娃，都想亲眼看一看。当大家看到失去父母的红军娃娃时，无不心生怜悯道“呀依娘结，呀依娘结（小孩可怜的意思）”，并纷纷伸出救援之手，把粮食和一些茶、盐、衣物等送到共特家，用以抚养红军娃娃。从这以后，就在远近乡亲更大范围内传开了共特抚养红军娃娃的

事。面对此情，索朗心想：如果被土官知道共特家藏有红军娃娃，不仅会被割舌、抽筋，而且红军娃娃也保不住。于是索朗就把红军娃娃从夺沟接到沙湾，当自己的儿子抚养起来。

然而消息最终还是走漏了。一些土官在沙湾村穷凶极恶地叫嚷：“索朗家藏有红军娃娃，如果不早点交出来，那就要重重惩处。”后因索朗八方托人说情，给土官送了厚礼，红军遗孤才幸免于难。就这样，这名红军遗孤落脚沙湾村。

在沙湾村，没有姓名的红军娃娃不仅得到了索朗的精心照料，而且得到了乡亲们的喜爱。为把他抚养成人，贫困的牧民们你一碗糌粑，我一坨酥油地匀出来，共同养育他，并亲切地唤他“一碗子”。渐渐地，这个牧民们的习惯称呼就成了这名红军遗孤的正式姓名。

在牧民们的悉心照顾下，“一碗子”健康快乐地长大了。长大后的“一碗子”，凭借着勤劳善良和质朴真诚，娶了一位善良美丽的藏族姑娘色尔姐为妻。两人婚后美满幸福，一起放牧，一起劳作，同时照顾年迈的索朗。

直到阿坝解放后，当地藏民才将这一秘密公布。知道自己身世的“一碗子”既为有着红军的血脉而感到无比自豪，又对养育自己的藏民们充满了深深的感激，是这片草原给予了他第二次生命，是这些淳朴善良的藏民们让他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他积极响应党

的号召，凭借着对草原的熟悉和多年的放牧经验，带领乡亲们发展畜牧业。在他的带动下，当地畜牧业生产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牲畜的数量越来越多，质量也越来越好。“一碗子”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感恩与担当。